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4月30日第10期 总第25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54 期

###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28）

#### 【专稿】

古 樟 烂尾工程——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

- 一、北大社教运动的背景
- 二、北大社教运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间的博弈
- 三、北大社教试点工作开始，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间博弈的继续
- 四、“二十三条”公布，北大社教运动发生转折
- 五、在各方博弈之下，北大社教运动终成烂尾工程

#### 【考证】

舒 声 文革中北大与地院关系考略

- 一、文革初期，北大支持地院反工作组
- 二、民族宫事件，《地院东方红》与《新北大公社》闹翻
- 三、1967 年 4 月 11 日，在北大发生严重的冲突
- 四、地院东方红支持北大井冈山
- 五、聂元梓暗中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反对派
- 六、有关人士对天派、地派的认识和评论

#### 【述往】

周 平 情系科大：岁月淌不尽的希望（上）

#### 【读者来信】

1. 胡宗式：杨继绳《天翻地覆》中的史实错误
2. 胡 杨：出书不要找美国南方出版社

#### 【本刊声明】

【专稿】

## 烂尾工程

###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

古樟

北大社教运动最终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它不仅没有解决北大原有的问题，创造出什么高校社教的“经验”或“文件”，反而激化了矛盾，加深了分歧，演变为一场“交锋激烈、反复无常的拉锯战。”——陈徒手

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是文革的预演。<sup>1</sup>同样，北大的社教运动，也是北大文革的预演。

#### 一 北大社教运动的背景

北大的社教运动有着广阔的背景，那就是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北大的社教运动，是这场全国性“四清”运动的一部分。“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大的社教运动，也是一场党内斗争，不过北大共产党组织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并且牵涉到党内高层，由此导致了与基层单位“四清”运动完全不同的结局。

必须指出，北大的社教运动，同学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北大的普通学生，对这场运动是非常不了解甚至是一无所知的。学生可以感受到的是，在那段时间，党员教师的授课质量明显下降，因为他们要参加许多会议，没有时间备课。

<sup>1</sup> 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人民出版社，2013年。

## 全国的“四清”、“五反”运动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在如何看待形势和如何化解危局的问题上，党内高层产生了意见分歧，另外，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和作风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严重关注。在国际问题上，中苏关系的破裂引起了毛泽东对“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认为党内高层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在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之后不久，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在北大社教运动开展之前，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已经有一年多了，中共中央就此下发了许多文件，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有所谓“前十条”、“后十条”。<sup>1</sup>“前十条”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文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条表现，指明当前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后十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除了“前十条”、“后十条”等一系列文件外，中央还批发了“四清”运动的一批经验材料或报告，著名的有王光美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陈伯达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简称“小站经验”），还有《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简称“白

---

<sup>1</sup> “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带有7个附件，于1963年5月20日颁发；“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于1963年11月颁发。

银厂经验”）。这三个文件，堪称是中央树立的三个样板。从这些文件来看，阶级斗争的形势真是严重得不得了。北大学生对这些文件了解不多，但许多人参观过在午门城楼上举办的“四清”运动成果展览，对其展示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程度无不感到惊讶。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对国内形势做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看法，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中央书记处于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由刘少奇主持对“后十条”的修改。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这个新的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文件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依靠”，等等。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导致‘四清’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一个有严重‘左’倾错误的文件”<sup>1</sup>。

在国际上，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至1964年7月，相继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这些文章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同苏共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影响巨大，“反修防修”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大理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分裂。当时的北大学生，在收听“九评”的广播和学习“九评”小册子的过程中，受到了“反修防修”的洗脑式教育。

### 中央工作会议将北大列为社教运动试点单位

据《彭真传》，1964年5月至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在城市进行的“五反”运动纳入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批进行。高等学校被列入第一批。北京市有三所

<sup>1</sup> 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第112页。

高等学校作为运动试点，其中之一就是北大。<sup>1</sup>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6月2日，彭真发言说：“四清”、“五反”运动开展以来，农村材料揭发不少了。现在看来，城市的问题更严重。……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如果那些人钻进来了，甚至到了党内，我们的阶级队伍不纯，怎么依靠？彭真提出：城市“五反”要和乡村运动配合搞，重新部署，分三大批进行。第一大批是县、区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大中工商企业、高等学校，大医院。……<sup>2</sup>

北大被选为第一批运动试点，大概就是彭真讲话的结果，这真是北大的灾难。

### 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大批判运动

在北大社教运动开始之前，与教育界关系密切的文艺界，也发生了严重情况，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写下了两个批示，对文艺界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根据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的精神，在文艺界开展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斗争。随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理论的指导下，批判运动又延伸到哲学、历史学等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翦伯赞的所谓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批判罗尔纲、批判“让步政策”……，一些小说、电影也受到批判。文艺界和学术界的这场大批判运动来势迅猛，堪称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期间的许多批判文章武断粗暴，故意混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界限，无限上纲，无情打击，起了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这些报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报刊的口径，被民众视为政治正确的标准。于是，政治气氛日趋紧张，而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越来越紧。北大的师生，包括所有的党员，都不可能例外。人们纷纷检查自己“阶级斗争的观念太薄弱”，却没有认识到这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

<sup>1</sup>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32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06页。

## 中央五人小组的成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示。批示是写在中宣部5月8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草稿上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sup>1</sup>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传达后，人们把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更严重了。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五人小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一称呼是后来才有的），由彭真挂帅。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会议还决定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sup>2</sup>

由此，可以向北大发号施令的上级领导机关，除北京市委、中宣部、高教部外，又有了一个中央五人小组。

## 二 北大社教运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间的博弈

北大的社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当时，“前十条”、“后十条”（以及后来的第二个“后十条”）都是运动的指导方针，“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等等则是运动的样板，“九评”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是考核领导干部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左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全国“四清”运动的高潮是1964年下半年掀起的，北大社教，正是这个高潮的一部分。

<sup>1</sup>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四卷，第340页。（以下简称《彭真年谱》）

<sup>2</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43页。

北大的社教运动，使北大共产党组织内部积累已久的分歧和矛盾严重升级、爆发，实际上成为北大文革的预演。必须指出，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北大党组织内部，中宣部、北京市委、中央五人小组和中央书记处都干预了这场运动，高层的分歧、矛盾和直接的介入，使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更加复杂。数十年后，陈徒手评论说：“北大社教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党内矛盾深重，涉及中央高层诸多的纠葛，每个拐点都是惊心动魄。”<sup>1</sup>

回顾历史事实，我们首先看到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之间的博弈。

### 中宣部调查组进入北大

首先出场的是中宣部。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没有几天，1964年7月2日，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10人便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显然是为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打前站的，任务就是摸底。派遣调查组的，首先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宣部领导层。至于陆定一是如何同更高级别的领导层商议此事的，笔者无从了解。但这样的事，显然不是中宣部几个领导说了可以算的。据《北大百年》的说法，调查组就是“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的。<sup>2</sup>

随后（具体时间不详），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也率人加入调查组，调查组增加到30人。

调查组进驻北大，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简称北京市委大学部）便深感紧张。北大是市委大学部直接领导的，那是他们的地盘。对于中宣部调查组，他们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据北京市委干部庞××的回忆，1964年7月初，张磐石到北大进行调查。大学部吴子牧、宋硕、彭珮云等人闻讯后非常紧张，议论猜测张磐石到北大进行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一致认为张磐石到北大来是“不怀好意”，“来者不善”，是来“整人”的，是来“找岔”的。当时北京市委正在开扩大会议。陆平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们特别关照陆平要“多

<sup>1</sup>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9页。

<sup>2</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加小心”，还建议他回学校后“安排”一下。<sup>1</sup>

###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现在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

就在张磐石率领调查组在北大开始调查时，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见了《红旗》杂志社的吴江、关锋、邵铁真和中宣部的龚育之（他们是为写作一篇批判文章去请示毛泽东而在那里候见的），康生、陈伯达在座。毛泽东的谈话，整理下来有八千多字，内容十分广泛，但中心是讲下乡“四清”和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现在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他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龚育之对毛泽东的谈话作了详细记录，整理出来后在中宣部内部印过。龚育之多年后说，毛泽东的谈话，许多地方都是谈当时的阶级斗争，对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往前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往后同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派、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思想都有联系。<sup>2</sup>笔者以为，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肯定可以看到这份材料，也肯定会受到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影响。

### 北大广大党员、干部对调查组的态度，如何对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从北大的干部、党员来看，调查组当然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接受调查组的询问，向调查组反映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调查组进校当天就听取的，是教务长崔雄崑、党委副书记谢道渊的汇报。<sup>3</sup>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被调查组约谈，或主动向调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应该有许许多多。除了聂元梓，系一级的领导干部到工作队反映情况揭发问题的还有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张侠和技术物理系戴新民、人事处副处长白晨曦等，他们都是些资历颇深的老干部，张是行政11级，戴是10级，白是13级。对于下面党员干部、党员群众提出的意见，进行调查核实，或采纳，或不予采纳，是调查组和后来的工作队的责任。对于提意见的人，应该实行“言者无罪”

<sup>1</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2</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sup>3</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09页。

的原则，不应该去整他们。但北大社教后期特别是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整肃积极分子，既不符合“二十三条”的精神，也背离了过去一贯的保护运动积极分子的做法。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聂元梓成为主要打击对象，受到批判。而罪名之一，就是向调查组反映意见，同张磐石的错误“一拍即合”。这是非常荒唐的。北大的这些党员干部，与之“一拍即合”的，实际上是当时毛泽东的路线。

必须指出，正好在北大社教运动正式开始之际，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谈到高等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sup>1</sup>在毛泽东这样的号召下，北大的党员教师，怎么可能逃避社教运动这场阶级斗争呢？

附带说明，笔者也是参加过农村“四清”运动的。贫农、下中农、中农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没有证据的怀疑，这是他们的权利。调查核实是工作队的责任，有的意见经调查证明并不属实，调查清楚就行了，反过来追究、打击积极分子的做法，是不允许的。

### 调查组的“一号报告”

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8月29日，张磐石向中宣部报送了“一号报告”（应即《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不纯的一些情况》）。该报告的全文不得而知，《北大百年》摘引了其中一段：“调查组自7月2日到北大以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猖獗，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又称北大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据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

---

<sup>1</sup> 转引自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1页。

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sup>1</sup>

“一号报告”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其内容则主要来自于干部档案。曾参加看档案的唐联杰说：“一看档案，不仅证实了聂元梓同志汇报的情况，而且认为问题更严重。从此，张磐石就认为陆平同志在干部路线上有问题，认为北大党委和行政的重要部门（如宣传、组织、人事、教学等）和一些系的党总支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一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青年知识分子手里。”<sup>2</sup>中宣部干部阮铭说，“猛然看到那些材料是很吃惊的”。<sup>3</sup>

在当时大抓阶级斗争和正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的背景下，调查组提出上述看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彭真自己不也说过，“我们的阶级队伍不纯，怎么依靠？”聂元梓是从太行山和延安走出来的干部，资历有限，见识不广，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颇有局限性，因此，她认为某些干部“政治上不纯”的看法也是不奇怪的。聂元梓向张磐石汇报情况，最初还是党委通知她去的。在当时中央下发了多份文件、传达了毛泽东多次讲话和大规模宣传“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的形势下，说聂元梓的意见影响了张磐石，那真是太抬举她了。

### 中宣部有关负责人和彭真对“一号报告”的批示，高层分歧展现

据《彭真传》，8月30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在“一号报告”上批示：“请定一同志阅示。看来，北大硬是存在着‘夺印’问题。”9月1日，陆定一批示：“请彭真同志阅后送中宣部童大林同志。登宣教动态增刊”。<sup>4</sup>显然，把北大当作要夺权的单位来对待，首先是中宣部领导层的看法。另外，一份文件登上《宣教动态增刊》意味着什么，望识者教之。

彭真看到上述报告后，没有立即对报告的内容表态，而是在9月5日给邓小平、康生及陆定一、张子意、张磐石写了一封信：“大专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政领导

<sup>1</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0页。

<sup>2</sup>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46），1965年12月1日。

<sup>3</sup>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45），1965年12月1日。

<sup>4</sup> 《彭真传》，第1133页。

干部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是复杂的，参加革命以后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肯定有些坏人或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些人，虽然是革命的，但又同资产阶级和反动家庭的思想、政治界限划不清楚，或者不能完全划清。因此，我同意此件登《宣教动态增刊》，同时提议就此组织一个五人小组，把北大的全部领导干部系统地研究一次，解剖一个麻雀，摸摸底，并解决北大的领导问题，取得典型经验。”<sup>1</sup>彭真提议，由张磐石和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后由公安部文化保卫局副局长侯西斌参加）、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副部长）组成一个小组，“由磐石同志任组长（子意同志最好有时也参加一下）”，主要任务是弄清北大干部的政治面貌。<sup>2</sup>

笔者无从了解诸位收信人对彭真这封信的反应。从《彭真传》披露的上述内容看，对于中宣部有关负责人提出的“夺印”的观点，彭真没有赞同，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笼统地对大专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干部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了一些解释，表明他不赞成“唯成份论”，但也“肯定有些坏人或资产阶级分子”。彭真主张“把北大的全部领导干部系统地研究一次”，“并解决北大的领导问题”。另外，成立五人小组，以及小组的人选和任务，也是彭真提议的。彭真同意将“一号报告”登《宣教动态增刊》。这种内部刊物肯定是可以报送到毛泽东那里的。毛泽东有何看法，无从得知。但毛泽东后来亲笔批示称北大是个“反动堡垒”，定性比“一号报告”还要严重得多。

彭真实际上是反对“夺印”观点的。在1965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在谈到北大“四清”问题时说：“我曾派人摸过底，认为北大不会有夺权问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结果，工作队把市委抛在一边，关系搞得不正常。要召集北大总支以上干部开会，总结一下，把运动落脚到改进教学工作。工作队的批评是帮助他们，但工作队也有缺点。”<sup>3</sup>

《彭真传》的编写者认为，从后来情况看，彭真实际上是不同意“一号报告”对北大

<sup>1</sup> 《彭真传》，第1133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33页。

<sup>3</sup>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四卷，第404页。（以下均简称《彭真年谱》）

干部队伍的估计的，更不同意说北大“硬是存在‘夺印’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彭真对‘一号报告’难以明确表示不同意见”。<sup>1</sup>笔者以为，彭真有不同意见，但表达非常委婉，缺乏尖锐性，态度不够鲜明，因此，他的意见遭到无视也就不奇怪了。彭真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呢？

高层的分歧，在“一号报告”上呈之后便已经产生了。这种分歧未能及时摆到桌面上，更未得到讨论和解决，这就决定了北大社教不会有好的结果。由此引起的政治博弈，北大党员教师们是绝对想象不到的，他们只是这场博弈中的棋子和牺牲品。

### 为应对“一号报告”，彭珮云被派往北大“蹲点”

“一号报告”上呈后，北京市委颇为紧张，立即做出了一项重要安排，就是派彭珮云去北大“蹲点”。1964年9月1日，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的组织关系暂时转到北大，行政关系仍在市委。

据时任北京市委干部庞××的回忆，彭珮云是领导的“掌上明珠”，一直留在市委机关工作，从来不肯把她放出去。这次不早不晚，偏偏在张磐石到北大进行调查时突然决定她下去“蹲点”，而且急如星火，要她马上下去。<sup>2</sup>北京市委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北大百年》的作者明确指出，北京市委“竭尽全力保护北大党委，与工作组进行抗争”，彭珮云的任务就是“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抗拒以张磐石为首的社教队的进攻”。<sup>3</sup>可见，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调查也才进行了两个月，势如水火的对抗局面就已经形成了。当年，社教运动中对立的双方曾为谁和谁“唱对台戏”的问题争论不休，多年后，《北大百年》的作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 为应对“一号报告”，市委大学部秘密调查北大干部档案

<sup>1</sup> 《彭真传》，第1133—1134页。

<sup>2</sup> 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下同。

<sup>3</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0页。

真正令北京市委感到紧张的，是“一号报告”揭发北大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市委干部庞××后来说这是个“致命问题”。据庞××回忆，彭真看到“一号报告”后，立即批送刘仁（时任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后十分紧张，急忙将宋硕、陆平、彭珮云和市委组织部的有关干部找来（有的干部是派车连夜从郊区县接回来的），问他们北大主要干部的政治情况，但他们却回答不出来。

据说“一号报告”指责北大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时候点了北大许多干部的名字，显然，这是查档案的结果。“一号报告”里引用的聂元梓那一句话，不过是她道听途说得来的印象而已，并无确切根据（聂没有资格查干部档案）。“一号报告”不可能仅凭聂元梓那一句话就提出这样的指责。

于是，市委大学部也要查干部档案了。“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指示宋硕组织一些干部，重新查看北大干部档案，把问题弄清楚。”<sup>1</sup>但是，办事人员害怕在调查组借档案以后大学部又来借档案会引起管档案同志的怀疑，更害怕此事被调查组发现，所以只能采取偷偷摸摸的办法，先由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去借档案，再由大学部干部带回市委机关来。

档案借回来了，市委大学部、组织部的一千人又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审查了这些档案，连陆平、张学书都参与审看档案。几天后，他们害怕张学书离开学校太久可能被察觉，又要张学书赶快回学校去，并指令张学书不要向调查组汇报看档案这件事。看完档案后，由几位市委干部分别写出每个干部的简单材料，包括简历、主要政治历史问题及初步审查意见等。最后和张学书电话联系，在一天晚上用小汽车将档案送回北大交给张学书。

他们还借来了聂元梓的档案，先由廖××审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庞××认为哲学系搞得最“乱”，聂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庞××不放心，又看了一遍，结果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调查组一无所知，倘若当时被调查组发现，会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

<sup>1</sup> 《彭真传》，第1134页。

彭真说的“我曾派人摸过底”，被派的人可能是秘书张道一，<sup>1</sup>但上述查档案的情况，也会汇报到彭真那里。

市委大学部既然也查了干部档案，为什么不向中央写一份报告，申明理由，对“一号报告”进行纠偏呢？

### 市委大学部秘密调查北大文科教材和若干教授的档案

除了查干部档案之外，市委大学部还抽调人员，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查看了北大文科教材和若干教授的档案。这是1964年10月11日由宋硕、彭珮云向市委干部庞××和公安局九处一名副处长正式布置的。宋硕传达彭真或邓拓的意见说，现在就是要搞资产阶级。有些人就是资产阶级。教育战线先试点。要摸大学资产阶级教授。系统地摸他们的情况。要把老教授与国民党、CC的关系清理出来。要看他们的讲义，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要从历史上政治上学术上系统地了解他们。小范围搞。要先搞北大文科。调档案，由九处以摸底、排队名义调。教材由大学部以作调查研究名义调。

为此成立了一个查档案小组，一个教材审查组。两个小组彼此隔离，互不来往，贯彻严格的保密制度。对于工作人员，表面上说是从教授队伍和学术两方面对高等学校的文科的阶级斗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但实际上调查的主要是北大的文科。

据参与查教授档案的陈××披露，<sup>2</sup>自1964年10月19日开始到1965年3月为止，陈××等三人共查阅了教授档案147份，其中北大文科教授112人，其他院校教授35人。北大文科教授中有50人是庞××提出要首先审查的，名单是庞××提出经邓拓批准的。147份档案审查后，每份都写有摘录的单行材料，大部分人都整理有卡片。

审查教材小组由6人组成，工作到1965年7、8月份才结束。他们通过北大党委、教务处借教材，甚至通过私人借学生的笔记本。

<sup>1</sup> 见张道一访谈录：《彭真秘书访谈录：毛泽东为何担心彭德怀要反他》，人民网·文史频道。

<sup>2</sup> 见陈××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按照宋硕的布置，审查小组写出的材料，一律送李×（《前线》编辑部干部，曾任邓拓秘书），由他负责出版一种简报《教育界情况》，送市委领导参考。对这件事，宋硕要求极端保密，不告诉学校，也不告诉机关其他同志，甚至对做这件工作的同志，也不能透露整个意图。该简报一共出了64期，其中有关北大的情况就有37期，占总期数的58%（另有编好未付印的北大情况6期）。这种简报是作为绝密材料上送的，以至正在精简简报的市委办公厅两次提出异议：这种登教材情况的简报怎么算绝密材料？<sup>1</sup>

为什么要这样做，市委干部庞××当时也是感到纳闷的。过去市委大学部从来不看讲义教材，从来没有系统地了解过资产阶级教授的政治历史情况，为什么现在突然积极抓起这件工作来了呢？庞××后来认为，“可以设想的方式是：在适当时机，将这批材料抛出去，转移社教运动斗争目标，将火烧到资产阶级教授身上，从而保护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后来推测，市委可以拿教材中存在大量问题为由，将社教工作队的军，指责他们不管教学和教授的思想改造，从而把矛头指向党外和教师，不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市委大学部布置专人编写《教育大事记》，矛头指向陆定一和中宣部

令人惊异的是，在审查北大文科教材和教授档案，以及编辑简报的过程中，邓拓、宋硕还布置专人编写《教育大事记》甚至摘编陆定一的材料，矛头直接指向陆定一和中宣部。

庞××说，宋硕在1964年下半年布置审查北大文科教材和教授档案时就提出来，要搞一个1958年以来党内党外教育工作会议的材料，排个大事年表。说这是邓拓要的。1965年上半年邓拓又催，庞××、李×、吕××一起编写了一份材料，是按问题搞的（如招生问题、生产劳动问题等），结果邓拓不满意，退回来让按时间顺序搞。结果这个所谓大事记主要是突出了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人在教育方面的言论。一开始宋硕布置得很简单。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材料，怎样搞法，当时都不明确。邓拓、宋硕始终没有告诉庞××等

<sup>1</sup> 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人搞这个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后来在搞的过程中，庞××看到陆定一等人问题很严重很突出，于是猜想可能是市委为了将来向中央揭发陆定一等人的问题，为了向陆定一等作斗争。庞××说，大事记搞出以后，邓拓把底稿也要走，当时很奇怪，邓拓为什么这样不相信大学部，为什么搞得这样鬼鬼祟祟。

李×说，编一个教育界大事记的任务是邓拓于1964年10月下旬向他布置的，并要求先编高等教育大事记。邓拓要求把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央和中央教育部门的决定，历次全国工作会议和宣传会议的文件、报告摘要出来，对比几年来对各种问题的提出的变化，从1958年搞起。他还说，这些年提法老变，反反复复今天强调这个，明天强调那个，例如清华大学的半工半读试点后来就受过批评。李×随后找了大学部，转达了邓拓的指示。李×当时的印象是邓拓也给大学部做了布置。李×说，邓拓布置这件工作，当时和后来都没有进一步说明它的用途。但李×后来认为，大事记提供的材料说明，这几年教育方面的问题是从中宣部来的，北大党委不过是执行而已，以此对抗北大的社教运动。

李×说，1965的二月底或三月，邓拓曾要秘书刘××和李×把档案科有关高教的档案借来，专门查找和摘要陆定一历次讲话中的问题。刘××和李×摘抄的陆定一的讲话，交给了邓拓。邓拓还亲自看了一部分档案，并在两个报告上划出了几段，叫刘××送给彭真办公室。邓拓在那个时候组织人收集陆定一的材料，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在文科教材问题上也可以把矛头指向张磐石。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后来说：“张磐石是中宣部副部长，主要抓高等教育的问题，在教育系统中，文科教材问题很大，他应该负很大责任，他却不问此事，也不抵制修正主义，他在北大公开讲，北大文科教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反对大家对文科教材提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文科教材是他亲手抓的。”<sup>1</sup>常溪萍并不了解北京市委大学部查文科教材之事，但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人，他知道一点上面的情况。其实，当年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最主要的主导者，是周扬。

<sup>1</sup> 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后来，由于北京市委同中宣部在北大社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些材料没有用上。

### 三 北大社教试点工作开始，

#### 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间博弈的继续

现在再来看看北大这个社教战场的情况。

#### 陆定一和彭真共同批准在北大进行社教试点工作的报告

在北大进行社教试点工作，是中宣部打报告正式提出来的，报告是陆定一和彭真共同批准的。

中宣部领导层和调查组没有重视彭真9月5日写的那封信，对于信中有所暗示但没有明确说明的不赞成“一号报告”的含义，则完全没有领会。中宣部调查组按照既定方针，拟订了《关于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计划（草案）》，提出从11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要“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中宣部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或中宣部的报告还提议从全国各大区抽调力量，组织较强的工作队，参加北大社教试点工作。陆定一的批示是：“大搞一番，取得经验，训练干部”。1964年10月21日，彭真审阅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批示：“同意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先搞一两个学校摸摸底，取得经验好分期分批普遍搞。”<sup>1</sup>

据《彭真年谱》，彭真在做出上述批示的第二天，便找陆平、张学书、彭珮云及宋硕谈话。彭真批评陆平等不蹲点，对学校阶级斗争形势心里没底。要他们到一两个系去了解情况，解剖麻雀，心里就有底了。并告诫他们，对干部队伍要有个基本估计，不然在社教运动中就会迷失方向。<sup>2</sup>从这几句简略的记述中，我们无从了解谈话的详细内容。但当时彭真对北大干部队伍已经“派人摸过底”，北大三位领导人和宋硕已暗中查过北大干部档

<sup>1</sup> 《彭真传》，第1134页；《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64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34页。

案，彭真的告诫无异是要他们在此问题上同工作组进行抗争。

彭真显然不同意“一号报告”的看法，但没有找张磐石谈过。彭真后来也说：“他（张磐石）写的报告我看了，我提议组织五人小组搞调查研究。（我）对北大有一些了解，但我应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指出要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偏差，我没有。我有责任，中宣部、市委也有责任。”<sup>1</sup>张磐石虽然不属北京市委管辖，但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报告的批准人之一，完全可以找张磐石谈话。笔者也没有见到彭真、陆定一共同找北大社教五人领导小组谈话的记载。他们为什么不先开一个会好好商量一下呢？领导层看法不一，又没有及时交流沟通，是导致北大社教顶牛、失败的重要原因。

### 强大的北大社教工作队

工作队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如上文所述，其成员均由彭真提议：张磐石、刘仰峤、徐子荣、庞达、宋硕，由张磐石任社教工作队长，刘仰峤任副队长。他们的级别都很高（中宣部的处是局级的）。中宣部从全国22个省、市抽调宣传、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条件适合的干部，组成一个庞大的工作队。至11月中，从全国各省调集到北大的工作队员共170多人，最多时达260人。<sup>2</sup>

工作队员的级别也很高，多为省市宣传部正副部长、教育厅正副厅长、大学党委正副书记、正副校（院）长等，仅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多达102人，可谓浩浩荡荡，阵容强大。如哲学系的工作组组长冯毅时任山西省教育厅长，是个11级干部，副组长季增则时任浙江省高教局副局长，级别为13级。经济系工作组的阵容也很强大，共有7人，工作组组长是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成员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等等。他们不仅资格老级别高，派头也很大。据时为经济系教师的杨勋回忆，“这些高级干部开会时不像教师们那样随便，他们端坐在会议桌两旁，散发着一一种说不清的威严气氛。……他

<sup>1</sup> 《彭真在北大社教运动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1965年6月29日在人大礼堂小礼堂）

<sup>2</sup> 《彭真传》，第1135页；《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64页。

们在开会时，桌前同时摆放着几副明煌煌金闪闪的高级眼镜，而且都以很权威的口气讲话。那架势使从未出过校门的‘三门干部’们大开眼界。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也许是一批包青天式的大人物，真要在北大大战一场，北大真要新生了。”<sup>1</sup>

如此强大的工作队奉中央之命来北大领导社教运动，其权威性、严肃性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彭真和中央书记处面前，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普通党员干部和教师哪里想得到上层还有着严重的斗争，哪里想得到张磐石不久会被撤职，而堪称全国最高级别的工作队会在“放假”的名义下星流云散。他们更想不到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参加运动的人后来会在“整风”的名义下遭到整肃、打击。这真正叫神仙斗法，凡人遭殃。

调查组和工作队的第一把手张磐石是一位老革命，中宣部副部长，马列主义水平、政策水平应该很高了，陆定一、彭真一致提名他来领导北大社教，说明对他一定有很好的了解。但是，张磐石后来被撤职后，又被指责工作作风不好，而且“坏得不成样子”（庞达语），说张磐石作风粗暴，随便训斥人，工作独断专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对抗“二十三条”、对抗中央书记处，等等，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中宣部是否从一开始就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呢？

在这里插一句后话。几个月后，张磐石被撤职，北大社教工作队在作了检查、道歉后在“放假”的名义下被解散。此前，许立群、蒋南翔受彭真之命分别为中央起草高等学校社教运动的文件。据龚育之回忆，“蒋南翔强烈主张不要派工作队特别是庞大的工作队到高校去搞社教，认为可以信任和依靠原来的党委领导运动，**派大工作队势必把原来的党委抛到一边，形成夺权，犯北大工作队那样的错误。**”<sup>2</sup>张磐石工作队在北大形成夺权，不仅有中央文件上的依据，<sup>3</sup>也是势之所然。倘若不是张磐石，而是别的什么人，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sup>1</sup> 杨勋：《我经历的北大文革》，[www.360doc.com](http://www.360doc.com)

<sup>2</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sup>3</sup> 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18日正式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已经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依靠”。

## 在工作队领导下，北大社教试点工作正式开始

11月5日，中宣部宣布正式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试点工作由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社教工作队领导。按照陆定一的批示，他们准备“大干一番”。

11月14日，工作队提出了《在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初步计划（修正稿）》，并提出在五人小组基础上成立工作队和队党委，张磐石任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刘仰峤任党委副书记。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全校每个党总支，都配有一个工作组。工作队员至11月20日才基本到齐，张磐石的“北大调查组二号报告”是1964年11月29日上报中央的，所以，整个运动要到12月才全面铺开。

“二号报告”的全文不得而知，只知道该报告在列举了哲学、技术物理等系的情况后说：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这个报告实际上把北大看成了一个“烂掉”的单位。“二号报告”起草之前，其内容由庞达于11月4日向五人小组作过一次汇报，11月16日又由刘仰峤向陆定一汇报，书面报告就是根据汇报材料起草的。“二号报告”并不仅仅是张磐石个人或调查组几个人的意见。

1964年11月15日，社教工作队召开了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张磐石向队员们介绍了来北大后的调查过程和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等八个系的问题后说：“北大有几个系的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哲学系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号召工作队要“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揭发校系两级领导的主要问题，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指出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单位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估计下，<sup>2</sup>张磐石对北大的问题同样也看得非常严重。此后，运动便在全校铺开。

11月18日，张磐石召开了全校社教积极分子大会，向他们介绍了哲学系、经济系、技术物理系等八个系的问题，说明北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动员积极分子们勇敢投入战斗。

<sup>1</sup> 阮铭1965年11月3日、4日的发言，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会学习会议简报》（45）。

<sup>2</sup>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五卷，第358页。

在短短的时间内，工作队就组织起了一支人数可观的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富有上进心的党员教师、党员干部们当然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当然要向工作队靠拢。另外，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社教运动之前，北大共产党组织内部的矛盾就已经相当尖锐了，否则怎么会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积极分子呢？

12月1日，北大召开校长办公会，张磐石、刘仰峤列席。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向与会者介绍了张、刘二人。可见，这是工作队负责人首次在校部正式亮相。张磐石作了长篇讲话。讲话内容未见披露。

按照张磐石12月1日讲话宣布的计划，全校党员干部和教师从12月开始学习双十条（应是“前十条”和第二个“后十条”），学习社教运动样板或典型的经验，学习“九评”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以此对照检查，看看北大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摸索共产党如何办好学校，知识分子革命化道路如何解决等重要问题。

对照检查之下，问题多多。显然，整个12月是一个揭发问题的月份。这种揭发，大概都是背靠背的。具体情况，笔者无从得知。

### 彭真、陆定一对北大调查组“第二号报告”的批示

12月份的一件重要事情，是高层对北大调查组的第二号报告有了批示。

据《彭真年谱》，12月13日，彭真收阅北京大学调查小组11月29日第二次报告。报告反映从9月中以来，根据党员群众揭发学校中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及从11月份开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彭真阅后，先与陆定一电话磋商，随即致信陆定一：

“最好把北大作为一个重点，集中力量，彻底地系统地加以调查研究，以便取得在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经验教训。”“工作组要发动和团结一切党和非党的革命分子及其他可以团结的人，先对北大一切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

东西，对一切违反党的阶级路线、党的方针、政策等东西，包括思想、政治、组织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放手地揭发批判（自然对于正面的东西，也应予以应有的注意），然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一切反动的错误的东西如果不破，无产阶级的正确的东西，就不能立，立起来也不会稳固，必须有破有立，才能使运动获得全胜。”

信中说：“如同意，请告北大工作队负责人，同时将信请康生、吴冷西、周扬核阅。”陆定一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并将彭的信刊登于《宣教动态》增刊。<sup>1</sup>

《彭真传》的编写者认为，从彭真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彭真仍然不同意把北大作为夺权单位对待，不同意工作队的一套做法，他强调要把北大作一个重点，‘彻底地系统地加以调查研究，以便取得在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经验教训。’

‘工作组要发动和团结一切党和非党的革命分子及其他可以团结的人’。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sup>2</sup>

笔者以为，彭真看到第二号报告后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先同陆定一电话磋商，然后写下这封不短的信，并请康生、吴冷西、周扬核阅。但是，彭真在信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调查组的报告有什么错误倾向，他所强调的，是一种更长远、更宏伟的设想，也有“大干一番”的气势。且矛头所向，范围不可谓不广，“一切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一切违反党的阶级路线、党的方针、政策等东西，包括思想、政治、组织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放手地揭发批判”、“一切反动的错误的东西”。这同后来的“横扫一切”已经相去不远了。陆定一同意彭真的意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彭真和陆定一还是一致的。倘若彭真在信中或电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把北大作为夺权单位对待，明确表示不同意工作队的一套做法，并且提出“三结合”之类的建议，效果肯定大不一样，

<sup>1</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77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36页。

绝不会发生“他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

北大工作队对这封信有何看法，是如何讨论的，不得而知。工作队眼下最要紧之事，是“揭盖子”——组织党员群众揭发领导干部的问题，还顾不到信中提出的好几个“一切”的任务。

### 校党委和校部的党内斗争

校内最高级别的斗争发生在校党委和校部，陆平首先面对的是党委班子内部的批评意见。

哲学系青年教师李清崑被抽调到工作队简报组工作，办公室还有几位中宣部的一般干部，他们有时向他透露一些情况。通过李清崑的回忆，我们得以了解当时校一级的一点情况。

最早向张磐石反映情况揭发问题的有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校长戈华、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崔雄崑、纪委副书记孟琳、副校长周培源等。在他们当中，有的是主动找张磐石谈的，有的则是由张磐石约谈的，他们都成为工作队所依靠的领导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在工作队的压力下，原先紧跟陆平的党委副书记谢道渊也揭发了大量问题，受到表扬，并加入了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有人背后戏称他为“起义将领”（谢的揭发颇具杀伤力，故陆平对谢最为痛恨）。副校长黄一然是个级别较高的老干部，曾任我国驻苏使馆文化或教育参赞，他在校部也揭发陆平的问题，并且在工作组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说：社教工作队进校使他感到“真共产党来了”。可见其对陆平党委之不满。这些校领导们同张磐石谈话，有时刘仰峤在场，有时庞达也在场，这些谈话都是很正式的，每次都有中宣部的干部记录。据说揭发陆平最多且较激烈的是崔雄崑，主要讲陆平重用和包庇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经济系总支书记龚理嘉，说王庆淑并未参加人民公社调查组，但陆平却要她在调查组反右倾大会上多次发言批判汪子嵩，调子很高捕风捉影多有不实之词。崔雄崑认为给汪子嵩扣上“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王庆淑起了很大作用。崔还谈到陆有个小圈



子，排斥他和戈华等人。戈华也揭发了干部路线问题，但讲得更多的是陆平拉帮结派：陆平把他从铁道部带来的伊敏安排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张学书为党委副书记、魏自强为省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排挤他和崔雄崑等人。有些问题特别是干部问题，陆平、伊敏、张学书、魏自强等人一起研究后就决定了，事后才告诉他，说他这个第二把手有被架空之感。孟琳是戈华的夫人，时任北大纪委副书记，反映的问题大体与戈华相同，但又加了一条说：据××系的一些教师反映，该系总支书记与一年轻干部有不正当关系，道德败坏，纪委要调查此事，被陆平压下不作处理。周培源讲的与上述几人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他是一位物理学家，颇为爱惜人才，对反右运动（似应为反右倾运动——引者）中那么严重地整丁石孙、汪子嵩等人，把他们打成阶级敌人，严加处理很是不满。周还还较多地揭发陆平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在办学方面乱指挥瞎折腾把北大搞得乱糟糟的。<sup>1</sup>

事隔50多年，李清崑当年听到的事情，好些已经失记，但从上面这点简要的回忆，仍然令人惊讶。北大的党内纷争，首先就发生在校党委、特别是常委一级。陆平连常委这个班子都没有领导好，遑论领导好整个大学了。资料显示当时有所谓“十八次常委会记录”，说明校党委常委中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连彭真都说：“我看了十八次常委会记录，感到问题很严重，把党搞分裂了。”<sup>2</sup>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这份“记录”还曾印发常委。如果有保存下来的，将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常委们揭发的问题，聂元梓这些系级的干部是不了解的，一般党员干部就更无从得知了。

陈徒手在《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一文中摘录了几段冯定在某次常委会议中的讲话（讲话日期不详——引者），并认为其发言“还是颇有锋芒，点中要害的”。笔者现抄录如下：

“……陆平、彭珮云同志你们是怎样去市委商量的，怎样利用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

<sup>1</sup> 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记忆》2018年5月31日第225期。

<sup>2</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陆、彭讲的不一样？（此处似应为逗号——引者）你们不弄清楚，我们很难判断……有些事情校常委会通不过，就到市委去一趟，回来说是市委的意见。

“……对王庆淑的庇护，讲了一些事实，不一定讲完了。为什么对王庆淑万般爱护，而对反对王庆淑的同志则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路线是很明确的。

“……陆平同志到北大不久，和江隆基（为陆平的前任）的关系上有问题：江在反右派上是有些错误的，陆与江闹不到一起，批评江右，有方向性错误是一件事，但弄到势不两立，不能共事，起码两方面都有问题，陆很不能容人。”（见1964年11月30日北大社教工作队整理《北大党委常委会讨论哲学系整风问题的十八次会议纪要》）<sup>1</sup>

陈徒手摘录的只有短短的几段话，但包含的信息足以说明问题是严重的。不研究“十八次常委会记录”，是无法深入研究北大社教运动的。何况，冯定还把矛头指向了陆平与市委的关系，这无疑会引起市委的反弹。

### 陆平顶不住了，向工作队承认自己和工作队唱对台戏了

尽管陆平得到彭真的坚决支持和保护，但在工作队的压力下，陆平很快就顶不住了。市委干部庞××回忆，1964年10月下旬，彭真曾设想让陆平到校外去参加四清，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后来，彭真又找宋硕、陆平、彭珮云商议，要宋硕、彭珮云帮陆平写一份检查，由彭真分送中央负责同志，以保护陆平“过关”。宋硕、陆平、彭珮云在市委大楼忙了三四天，写出了一份检讨，但还没有等他们送彭真审阅，陆平就向工作队承认自己和工作队唱对台戏了。<sup>2</sup>在当时情况下，和工作队“唱对台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另一位市委干部李×回忆说，听邓拓说，有一次邓拓同陆平谈话，就发觉他有些不对头，没有与他多谈。果然他第二天就承认错误，趴下了。<sup>3</sup> 陆平为什么“趴下了”，又向工作队说了些

<sup>1</sup>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第217页。

<sup>2</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3</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什么，笔者无从查考。但工作队要追问，是毫无疑义的。北大常委会上追彭真、刘仁的情况，可能确有其事，这种“情报”也被报告到市委。<sup>1</sup>这不能不引起彭真和北京市委高层的严重关切和反击。《北大百年》的作者指责工作队“真正的目的在于揪出彭真”，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事出有因，或许同上述事件有些关系，但说工作队还要“瞄准刘少奇”，<sup>2</sup>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总之，中宣部工作队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在北大社教问题上的对立已日趋明显和严重了。

### 工作队推进社教运动向纵深发展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和揭发问题，工作队要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下一步运动的动员了。报告由刘仰峤来做。

1965年1月6日，社教工作队召开北大党委常委扩大会，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刘仰峤作报告。他说：我们学校的运动在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已初步揭开，初步形成了一个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员已有200多人。现在准备有步骤地把运动推向党内外，发动大家揭发领导的问题。他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的领导骨干中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学校里首先是校党委。应当指出，刘仰峤关于运动重点的提法，同后来“二十三条”的提法——“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致的。

中央文件此前已经规定，社教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北大党委正处在被审查的地位，工作队召开北大党委常委扩大会，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能说是“越俎代庖”。这在全国都是一样的。

迄今为止，社教工作队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按部就班地推进社教运动：组织党员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组织积极分子队伍，揭发党内领导干部的问题……，被揭发的重点，校一级是陆平，各系则是总支书记。负责对北大共产党组织和主要领导人做出政治判断的，

<sup>1</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2</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4页。

应该是工作队党委及其领导人，对各系负有责任的，应该是相应的工作组和工作队。党员中的积极分子，一般是不了解全面情况的，他们都是听命于工作组的。如果工作组对北大问题的判断或定性发生错误，是不应让积极分子承担责任的。

刘仰峤1月6日报告的实质，是要积极分子们起来同各单位总支书记、同陆平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所谓“面对面的斗争”，在当时条件下，就是当面揭发问题，进行批判，批判时上纲上线，显然是避免不了的。当面提意见，本来是共产党的传统。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者加勉”这些都没有了，许多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进行打击报复。自反右、反右倾以来，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教训已经太多，党员们也都心有余悸，因此，刘仰峤的动员，并没有达到工作队想要的效果。张磐石不得不亲自出马，作进一步动员。

### 张磐石作动员报告，推动“面对面的斗争”

1965年1月11日，工作队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大会，张磐石作动员报告，他说：北大社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高潮已初步形成或接近形成，整个北大从校到系，20条战线团团包围起来……现在是至关重要的时刻，是决定胜负的时候，要抓住有利时机，乘胜前进。

张磐石这次报告的全文，笔者无从查考，但报告火药味十足应无疑问。这次动员会之后，北大各单位“面对面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据说被批判斗争的有59人。<sup>1</sup>李清崑回忆说，“社教运动全面展开后，根据工作队领导的部署，许多系和校部普遍将矛头指向了单位的领导，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只要群众一被发动起来，过激情绪必然出现。在各类人物的发言中，虽不无正确的批评意见，但也出现了不少捕风捉影，严重不实，胡乱上纲上线，翻老底，打态度等过火斗争的言词，使不少干部受到伤害。”<sup>2</sup>

<sup>1</sup> 李×在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中说，到1965年3月18日，被批判斗争的59人，就有52人翻了案。

<sup>2</sup> 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记忆》2018年5月31日第225期。

据《彭真传》，张磐石这个报告的记录被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看到后，感到“大为吃惊”，批评说：“斗争”、“斗争”，仅在报告第一部分就用了40多次，“斗、斗、斗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机会主义。但通篇报告就是不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讲‘团结—批评—团结’，却要在北大打一场淮海战役，把被批判的人当成敌人。”<sup>1</sup>《彭真传》没有披露中宣部这位领导同志是谁，详情也不得而知。这位领导同志已经看出了问题，那么，有没有对张磐石提出批评呢？有没有向中宣部领导层提出意见呢？

这是张磐石领导下的北大社教的揭发问题阶段，按历次运动的规则，后面还有核实定案和组织处理的阶段。即使确实犯了错误的干部，也有“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确实搞错的，也可甄别平反。但是，北大社教在揭发阶段就发生了转折，社教工作队主导的运动到这时就停顿了。

#### 四 “二十三条”公布，北大社教运动发生转折

##### 中央发布“二十三条”

发生转折的节点是中央于1965年1月14日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简称“二十三条”。

1964年12月15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再加上其他复杂的个人因素，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步由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冲突。这实际上也成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的转折点，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的一系列做法的严厉批评，也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即“二十三条”的制定。中央在发出这一文件时还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

---

<sup>1</sup> 《彭真传》，第1137页。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在此规定之下，“前十条”、“后十条”和第二个“后十条”不再提起。

笔者还记得当年在学生宿舍中学习、讨论“二十三条”的情景。同学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得要领，文件中被批判的几种“错误提法”，在我们学生的脑子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但谁也想不到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文件批判的是刘少奇。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文件的背后，中央高层发生了重大问题。学生们不知道，“四清”运动已由此发生了转折，北大的社教也即将发生转折。

### 四清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人们把“二十三条”当作反“左”文件

在“二十三条”出台之前，“四清”运动中已经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过火斗争等严重的“左”的错误。“二十三条”纠正了第二个“后十条”以及前一阶段一些过“左”的做法，规定了一些有利于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和政策。同时，“二十三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发展了以前的“左”的观点，使阶级斗争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因而，这一文件也存在严重的错误。<sup>1</sup>

在当时，人们首先是把“二十三条”当作反“左”的文件来看待的，对于其中更危险的、即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普遍缺乏认识。

薄一波回忆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倒是《二十三条》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sup>2</sup>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记录了他的思想历程：“二十三条”下达之时，李新正在甘肃张掖农村领导一个工作组进行四清，他们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统一了思想（主要是说服工作组内的地方干部），纠正了“左”的错误，顺利完成了—一个生产大队的四清

<sup>1</sup> 参见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第181—第184页。

<sup>2</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34页。

任务。30多年后，李新为写这段回忆录，重读了“二十三条”文件，这才发出“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的惊叹。<sup>1</sup>

何止李新，就是身居高位的彭真，也没有认识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正涵义和真正的矛头所向。毛泽东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批评刘少奇时，已经引起了他对刘少奇的“警惕”。实际上，从1965年初起，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已经在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了。正当彭真四处讲话做报告宣讲“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认为社教运动“不能解决问题”，打算发动“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江青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动，也已经启动了。江青就是在1965年2月赴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为纠正“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所作的努力，成为他反对社教运动的“罪状”。“五一六通知”附件中，把“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列为彭真的“罪状”之一。不久，中共北京新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对“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进行批判。<sup>2</sup>彭真的讲话、报告多得很，为什么要发通知专门批判他有关“四清”运动的讲话呢？显然，毛泽东对彭真这几篇讲话早有看法了。

### **“二十三条”出台之前，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其做法也是很“左”的**

在“二十三条”出台之前，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其做法也是很“左”的。如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sup>3</sup>通县“四清”工作总团后来的统计说，运动期间发生非正常死亡212起，共死亡141人，还有多种形式的体罚。<sup>4</sup>彭真在1965年2月5日的一次讲话中，承认“发生了乱斗干部的偏向，使工作队、社队干部和群众间出现‘顶牛’现象。”<sup>5</sup>彭真在1965

<sup>1</sup> 参见李新：《流逝的岁月》，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6—第398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30页。

<sup>3</sup> 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第167页

<sup>4</sup> 参见《彭真传》，第1116页。

<sup>5</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96页。

年5月4日的另一次讲话中，提到“通县地区的‘四清’试点中，基层干部撤换了百分之四五十，斗争中发生了一百七十多起打人事件。”<sup>1</sup>必须指出，有些地方的过“左”做法，如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直接插手的地方，并不是北京市委所能够控制的。

在“二十三条”出台之前，彭真本人关于“四清”的指导思想也是“左”的。据《彭真年谱》，1964年7月25日（这正是中宣部调查组进入北大开始调查的时候——引者），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讲话，其基调就是反“右倾”的。彭真讲话说：“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四清’、‘五反’搞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怕伤害干部，二怕犯一个指头的错误，三怕损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批评干部的‘四不清’是挽救干部，不是伤害干部；既要工作，出现一个指头问题是正常的，不能因噎废食；讲团结是有原则的，不应当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不敢进行斗争。……北京市的‘四清’、‘五反’，发动群众不是过火而是基本不够，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发动起来。”<sup>2</sup>1965年1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学习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后，还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报告检查右倾思想的情况。报告中列出了右倾的三大表现和产生右倾思想的两大原因。<sup>3</sup>笔者注意到，张磐石在北大召开全校社教积极分子大会进行动员的时间是11月18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张磐石和北京市委在社教问题上都有着“左”的倾向，双方没有根本的区别。11月28日和12月7日，北京市委又两次向中央和华北局写报告，继续检查“右的错误”。<sup>4</sup>

据《彭真年谱》，1964年12月18日，彭真将郑天翔、贾庭三《关于北京市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的汇报》核改后分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阅。这个文件介绍了7个工厂的情况，“这七个厂原来都被认为是一类厂，现在一摸，情况都很严重，虽然程度不同。”报告说：“主席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过去领会不深，现在看，北京市的工交建筑企业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拿主要企业来看，可能不止三分之一”，说明“我们去年领导‘五反’运动，高估了革命的力量，低估了敌

<sup>1</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414页。

<sup>2</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46页。

<sup>3</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72页。

<sup>4</sup> 《彭真传》，第1111页。



情，犯了右倾错误”。<sup>1</sup> 北京市委对形势的这种估计，同张磐石对北大形势的估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 “二十三条”出台后，彭真的思想转了弯，开始纠“左”

“二十三条”出台后，彭真的思想很快转了弯，他把“二十三条”当作“反左”文件，开始着力纠正运动中“左”的倾向，对“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重要提法却无意地、或者就是有意地忽略了。1965年1月20日晨，彭真致信毛泽东，要求当面请示当前社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彭真年谱》摘录了信中提出的六个问题，并载同日下午至晚上，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研究当前社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sup>2</sup>另据《毛泽东年谱》，谈话时间是在晚上，刊载的毛泽东的指示，只有一句话：“毛泽东提出，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sup>3</sup>毛泽东还说了些什么话，不得而知。彭真信中提的问题，是彭真后来所作一系列报告的基础，毛泽东对彭真的意见表示赞同了吗？对于彭真无视“走资派”问题的倾向，毛泽东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毛泽东强调让人民群众直接阅读“二十三条”原文，遵循“二十三条”，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

同毛泽东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月21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向在京的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干部990多人作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据《彭真年谱》，“报告遵照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及二十日晚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讲了七个问题。”<sup>4</sup>彭真的报告，纠“左”的意向十分明确。《彭真年谱》所引报告文字颇长，但明确传达的毛泽东指示，也就是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那一句话。

彭真在这次报告中也提到了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说：“现在就是要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要让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无原则的问题，冲淡或干扰了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不要搞唯成分论。出身成分是不能选择的，

<sup>1</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81—382页。

<sup>2</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89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五卷，第471页。

<sup>4</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90页。

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可以选择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是马列主义的，唯成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不要搞生活细节，不准追男女关系。”<sup>1</sup>彭真还多次讲：“要重在表现，不要搞唯成份论。在知识分子中，一般不搞成分、出身、历史问题。”<sup>2</sup>彭真的这一讲话，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 陆平、彭珮云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翻案”

1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对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北京市党的干部状况及通县地区“四清”工作队的工作，作了基本的估计。报告强调“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这样估计，运动中也会迷失方向的。”报告说，“对工作队的工作，应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发现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煞住了一些歪风，但是把干部扔在一边，没有搞三结合，斗错了一些干部。”报告“要求大家以党的‘二十三条’为准，分头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错误。”<sup>3</sup>

市委扩大会议开了十天，陆平、彭珮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先后在会议的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据《彭真年谱》所载，他们发言的主旨是批评社教工作在北大抛开原党委的干部，搞唯成分论，乱斗干部的错误做法。北大党委6名书记被斗了5人，14名常委被批判8人，连党委书记、副书记向中共北京市委的请示汇报也被诬为“翻案”，搞阴谋活动。<sup>4</sup>另据陈徒手考证，“陆平、彭珮云在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一反几个月来的软弱和委靡，言辞变为激烈，令熟悉政治形势走向的与会者大为震惊。”<sup>5</sup>据市委干部庞××回忆，陆平一开始不敢翻案，怕被扣上反对中央的帽子，后来是在项子明、宋硕积极鼓动下才作了翻案发

<sup>1</sup> 《彭真传》，第1120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39页。

<sup>3</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92页。

<sup>4</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402页。

<sup>5</sup>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第220页。

言的。<sup>1</sup>笔者不了解陆平、彭珮云发言的详细内容，但他们的发言稿后来由彭真上送中央，北大工作队也印过，未来的研究者，或许可以查考得到。

会议期间，王庆淑也到市委要求找彭真谈话，彭真指定宋硕去谈，王庆淑谈了16个小时，李××在场作的记录。<sup>2</sup>后来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有与会者要求印发这份记录。

对于北大社教工作队来说，陆平、彭珮云的发言无疑是一种挑战。陆平曾经自己要求在常委会痛哭流涕做了几次检讨，曾几何时，又反过来攻击社教运动。工作队印发了陆平在市委的发言，并于2月9日召开了社教工作队党委扩大会，让陆平把他对运动的意见又讲了一次。2月17—18日，社教工作队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对2月9日陆平的发言进行批驳。这些会议的详细情况，有待查考。有人反映，听了陆平的发言后，“连过去受他蒙蔽的少数人也对他的不老实表示气愤”。响应陆平的，只有彭珮云和宋硕。<sup>3</sup>于是，北大社教运动进入了“顶牛”状态，一场辩论不可避免。在当时形势下，陆平一方要想赢得辩论是很困难的。正在这时，中央五人小组下达了“停止争论”的指示。而且，工作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意见，工作队副队长常溪萍在2月9日的会上也发言批评了工作队。

### 彭真为扭转北大社教方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就在这一期间，彭真为扭转北大社教方向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1965年2月14日，彭真致信刘少奇，报告在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中央宣传部派出的工作组和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意见不一致”，并附上了1964年8月29日中宣部调查组根据人事档案整理的校系主要干部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的材料《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不纯的一些情况》（即“一号报告”），和8月30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在报告上的批示：“看来，北大硬是存在‘夺印’问题。”信中说校内“现在分歧很大”。<sup>4</sup>

彭真致刘少奇信的详细内容为何，刘少奇对此信有什么批示，《彭真年谱》未载。

<sup>1</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2</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sup>3</sup> 参见阮铭1965年3月1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写的信。

<sup>4</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97页。

据《彭真传》，2月15日，彭真接到两封信，一封是北大社教工作队一名队员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传达“二十三条”精神是刮起“翻案风”，否定前一段运动；另一封署名“一些党员干部”的信中则反映“四清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彭真对前一封信批示：“请万里同志自己把报告内容检查一下，有无问题。”对后一封信批示：“关于北大问题，我和定一同志已商议了一个着手解决的办法。”两封信均送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周扬阅。<sup>1</sup>

彭真和陆定一“商议了一个着手解决的办法”，说明他们要联手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干预了。他们是什么时候商议的，笔者不得而知，这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他们商议的办法似乎并不灵验。

据《彭真年谱》，1965年2月17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中央五人小组会议，研究文化部门当前的社教运动。彭真讲话强调：要以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社教运动的性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总结经验。北大工作队也要总结经验，研究今后怎么做，不要顶在过去的一些事情上，紧张空气要放松一下。会后，陆定一即向北大工作队作了传达。<sup>2</sup>五人小组会议详情若何，与会者都说了些什么，会后陆定一是何时传达的，又是如何传达的，北大工作队有何反应，这些都无从得知，有待未来的学者考查。

据《彭真传》，2月22日，陆定一向中宣部所属各工作队作报告，指出：一部分同志认为我们的工作和“二十三条”完全符合，这种看法不好，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他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实行“三结合”，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他特别讲到北大，说：关于陆平，我问了好多人，要从大的方面看他，许多事情都是做得好的。当然，他有缺点错误，但总的看，还是好人犯错误。北大工作中的问题，似乎看成主要责任都在陆平？可是反过来想想，主要责任是否在我们，我们下面还有教育部嘛！对他的问题可能

<sup>1</sup> 《彭真传》，第1140页。

<sup>2</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98页。

是肯定过早了。现在搞成两肚子气。双方都要学习“二十三条”，检查自己的缺点。<sup>1</sup>

显然，陆定一的思想也已经转变了。这种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张磐石和北大社教工作队将失去上级的支持，无论上级原先说过些什么话，批过些什么文字。但陆定一采用的召开大会作报告的办法，效果并不好。陆定一应该先做通他的副部长的思想工作。

1965年3月1日，彭真将陆平、彭珏云1月2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和持不同意见的工作队副队长2月9日在北大工作队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一并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阅。<sup>2</sup> 陆平和彭珏云发言的主旨，上文已经引用，不赘。“持不同意见的工作队副队长”，当是指常溪萍。由此，矛盾摆到了最高领导层面前，但毛、刘、周有何指示，不详。邓小平对陆平、彭珏云的发言是肯定的，说“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sup>3</sup> 邓小平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的这句话，不详。

### 中央书记处会议

随后，问题摆到了中央书记处面前。

1965年3月2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文艺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情况。

1965年3月3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化、教育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对于北大社教来说，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决定北大社教运动命运的会议。张磐石和万里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了话，但笔者未见到讲话全文。《邓小平年谱》刊载的讲话内容为：对前一段的工作，一是要肯定成绩，二是要指出缺点。“二十三条”没有出来之前，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要总结经验，要研究根据“二十三条”，学校该怎么搞？运动的范

<sup>1</sup> 《彭真传》，第1140页。

<sup>2</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402页。

<sup>3</sup> 《彭真传》，第1139页。

围有多大？要达到什么目的？应立即停止对冯定每周7小时的批判。运动的方向要转到落实教学，调动教职员工作积极性方面。工厂要比较迅速地转到生产管理上。“二十三条”出来后不按“二十三条”总结经验不行。在谈到红与专问题时指出：不能讲唯成分论。团员要帮助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使之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部分学生忽视读业务书。现在学校的课外活动太多。<sup>1</sup>

《彭真传》刊载的邓小平讲话内容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北大社教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缺点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这个问题不只是北大有，中央要承担责任；二是开始对北大的情况估计错误，当作“烂掉了”的单位去搞运动，以夺权问题对待，这是一个错误；三是斗争方式有严重的毛病。邓小平还说：运动搞了几个月，也没有落脚到教学上。今后运动要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办事。解决北大社教前一段的题，目的是解决今后大学里运动怎么搞的问题。<sup>2</sup>

彭真在这次会议上有长篇发言，《彭真年谱》所刊内容占一页半的篇幅，《彭真传》所载较简略。据《彭真传》，彭真说：我曾派人摸过底，认为北大不会有夺权问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结果工作队把市委抛在一边，关系搞得不正常。要召集北大总支以上干部开会，总结一下，把运动落脚到改进教学工作。彭真还说：前一段的问题主要由中央负责。北大党委应先就北大自己工作中的问题做自我批评，不要先批评工作队，要团结。<sup>3</sup>

根据彭真的建议，会议决定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分别召开工作队干部和北大干部会议，用“二十三条”统一思想，解决“顶牛”问题，迅速扭转局面，共同搞好社教运动。<sup>4</sup>

如何评价陆平，是北大社教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如何评价陆平，其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1965年6月29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小组扩大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彭真说，对陆平，“我向毛主席讲是好人犯错误，没

<sup>1</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49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41页。

<sup>3</sup> 《彭真传》，第1141页。

<sup>4</sup> 《彭真传》，第1141页。

有讲量。毛主席马上讲，好人犯了一些错误。”<sup>1</sup>毛泽东是哪一天在什么场合讲这句话的呢？彭真没有说。待考。另外，“一些”又是多少呢？如何理解呢？当时就有人认为，“陆平这一些错误也是路线性的错误”。如果毛泽东确实说过“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那么又如何理解一年后毛泽东亲笔批示说北大是个“反动堡垒”呢？如果一开始就明确陆平是“好人”，仅仅是“犯了一些错误”，又有什么必要兴师动众，派那么庞大的、高级别的工作队呢？

书记处会议究竟是怎样开的？与会者是怎样讲的？有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过？待考。

据龚育之的文章，3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是有一份文件的，叫《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是为贯彻‘二十三条’，针对北大和北大社教的具体情况而发的文件。”<sup>2</sup>这份文件是什么样子的，待考。

书记处会议之后，中宣部领导层是如何研究工作队问题的呢？待考。

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在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领导层已经联合起来，要对工作队施压，要他们扭转方向了。

1965年3月4日下午，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未见刊布。

### 万里召集北大干部开会

按照彭真的布置，1965年3月5日，万里召集北大校党委陆平、戈华、彭珮云等开会，总结前一段工作，解决北大党委和工作队之间的分歧。万里说：我列席了三日下午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书记处认为“二十三条”以前，北大工作队的毛病是和校党委没有结合，扎根串连，找毛病，这是普遍性的问题。但“二十三条”下达两个月了，工作队没有认真总结经验。书记处的结论是：北大是办得比较好的；陆平是好同志，工作中犯有某些错误。<sup>3</sup>

### 陆定一向工作队作报告

<sup>1</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423页。

<sup>2</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sup>3</sup> 《彭真传》，第1141页。

同日还有一个会。《彭真传》载：当日，陆定一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及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他要求大家都来联系自己的工作好好学习“二十三条”，批评有些同志说自己“从前执行的统统和‘二十三条’符合的说法是不对的”。最后宣布：把北大社教五人小组扩大为八人小组，增加了校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戈华、彭佩云，由八人小组来领导北大社教运动。<sup>1</sup>

###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3月9日至3月19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二十三条”。此即“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据市委干部庞××回忆，“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是北京市委想要开的，市委领导层初步商定方案以后，为了形式上通过一下张磐石，宋硕曾找张磐石商量，张问这是不是彭真的意见，宋避而不答。中宣部几个部长商量，也不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后来书记处开了会，决定由北京市委负责召开这次会议。<sup>2</sup>

北京市委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下了很大功夫。“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是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并非“党员大会”，出席的人员是有选择的。为此，北京市委作了充分的准备。庞××曾参与确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他回忆称，出席会议的名单和召集人的名单主要是由彭佩云和学校中的“右”派商量后提出，最后经宋硕同意。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竭力设法让“右”派尽可能来参加会议，以造成数量上的优势。如校一级确定由崔雄崑等负责学校工作，陆平、张学书等全部与会，在一些系里也作了这样的安排。有的人不能经常出席会议，也列为出席会议人员，但可以经常请假。有的人不是校、系负责干部，本不应与会，就别立名目，把他们拉来做会议工作人员，必要时出席小组会议。在确定小组召集人方面，也有相应的安排，如哲、经、法小组，本应由聂元梓担任召集人，他们要排斥聂，

<sup>1</sup> 《彭真传》，第1141—1142页。。

<sup>2</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之。



但“右”派中又实在没有人可以担任，就指定肖××当召集人。<sup>1</sup>

会议还有若干联络人，由庞××负责，每天听取汇报，了解动向。宋硕、彭珮云一般都会参加听取汇报。所谓了解动向，一是了解“右”派动向，如什么人翻了案，什么人没有翻案，还有什么顾虑，等等。有些联络员还负有鼓动“右”派翻案的任务。此外，联络员还汇报左派动向，如什么人今天回学校去了，什么人和什么人在一起谈话，等等。这次会议有《简报》，还有一种《动态》，不便于登会议简报的，便刊登在《动态》上。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的主角是万里，开幕时万里作了讲话。笔者不了解讲话的全文。据《彭真传》，万里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他要求大家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总结工作，统一认识，特别提出受批判的人与批判别人的人的关系应尽可能调整好，都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参加会议的校、系主要干部96人。张磐石、刘仰峤参加了动员大会和总结大会。<sup>2</sup>

《北大百年》的记载是：会上，万里郑重强调：中央书记处指定我召开这次干部会，目的是要大家认真学习“二十三条”，按“二十三条”精神总结北大的工作，以便在自觉的基础上，配合中宣部派到北大的工作队，把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到底。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万里又指出：对待干部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有错误的干部，应当“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不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如果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就没有好结果，后患无穷。<sup>3</sup>

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但会议进程表明其真正目的是要鼓动前一段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翻案，让他们提意见出气。有些人前一段时间作了检讨，承认了某些错误，现在要把以前检讨的东西推翻掉。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庞××回忆，“开始东风压倒西风。左派义正辞严，右派无言以对”。陈徒手写道，万里的主旨报告“变相推翻了张磐石及工作队以往

<sup>1</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2</sup> 《彭真传》，第1142页。

<sup>3</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5—316页。

的‘社教战斗成就’。形势骤变，彻底翻盘，北大社教积极分子顿时陷入慌乱震骇、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在第一天下午听万里报告时不少人表示根本听不进去，很多地方想不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sup>1</sup>

面对这种情况，彭真决定由万里向到会干部传达中央书记处3月3日会议精神。

万里并没有向全体与会人员作报告，只是在3月12日晚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讲了话，联络员和记录均未参加，因此当面听到万里这次讲话的人并不多。万里也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意见。市委干部李×回忆，“会后，宋硕、彭珮云大为得意，彭珮云、李××给联络员做了传达，绘形绘色，大加渲染。宋硕说，万里不直接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用插话的形式，针对活思想来讲，这个办法好，马列主义水平高。”<sup>2</sup>另据陈徒手记述，“聂元梓告诉系里社教积极分子，说小组召集人会议开得很晚，交锋激烈，万里拍了桌子发火，不得不拿‘王牌’（指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指示）压人。”<sup>3</sup>

万里的讲话影响很大，庞××回忆说，“传达后左派受到打击，右派活跃起来，纷纷翻案。”<sup>4</sup>李×回忆说，“在翻案过程中，宋硕布置联络员说，如果被斗的人要求谈话，可以根据万里讲话的精神，做有倾向性的引导，也要注意不要讲得太明显。如果看到思想真动了，也可以主动找谈话。第二组的张××要求谈话，我就根据宋硕的指示，鼓动他翻了案。这样上下鼓动，就掀起了翻案风。记得到3月18日，被批判斗争的59人，就有52人翻了案。……关于这次会的总目的，到这时宋硕才说出来，他说，“下段会怎么开？翻了案就走人，我的任务就完成了。”<sup>5</sup>宋硕在底下的讲话，明确地揭示了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

也不是所有受批判的人都急于翻案。如谢××和石××就迟迟没有翻案，他们在运动中揭发了陆平、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些严重问题，万里、宋硕、彭珮云等对他们恨之

<sup>1</sup>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第226页。

<sup>2</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sup>3</sup>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第228页。

<sup>4</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5</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入骨，当联络员们议论到他们还没有翻案时，宋硕说，别理他，不翻才好呢！万里认为一定要把他们开除出党，要让他们长期劳动改造。后来还是刘仁说，可以把他们留在党内，改造他们。另外还有人过去承认了错误，已被工作队“解放”，也不愿在会议上翻案，宋硕就说，张磐石就是拿“解放”作手段来收买。<sup>1</sup>在宋硕眼里，张磐石无论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3月17日，中宣部开始直接抓工作队的工作。<sup>2</sup>市委干部李×回忆，“3月18日，宋硕从外边开会回来说，中宣部召集会议，陆定一让张子意、许立群抓北大运动，万里和他参加了会，在会上讲开了，意见都谈了。看来，这时旧市委旧中宣部合流的买卖成交了。”<sup>3</sup>既然陆定一让张子意、许立群抓北大运动，张磐石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于19日结束，万里、张子意都讲了话，讲话全文未详。《北大百年》用一个段落的篇幅介绍了万里的讲话，用一句话概括了张子意的讲话：“他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在肯定前一时期社教队成绩的同时，着重讲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张子意“肯定前一时期社教工作队成绩”的话都是虚的，对工作队的批判才是实的。《北大百年》的作者接着指出，“张子意的讲话对张磐石产生釜底抽薪的效应。”<sup>4</sup>

张磐石及其工作队既然犯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错误，还有什么必要再存在下去呢？

李清崑是社教工作队的工作人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有耳闻未知其详。李回忆称，“据说在会议期间陆平、戈华、崔雄崑、谢道渊、黄一然等领导都作了检查，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大家对崔、谢二人提出的批评最多，认为他们在运动中紧跟张磐石，把北大搅浑了水。一些运动中受批判和冲击的干部也出了气。”<sup>5</sup>

在北大社教运动及后来的各种会议中，“把北大搅浑了水”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一种说

<sup>1</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另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2</sup> 庞达1965年11月2日的检查，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会学习会议简报》（44），1965年12月13日。

<sup>3</sup> 参见李×1967年3月29日写的材料。

<sup>4</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6页。

<sup>5</sup> 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记忆》2018年5月31日第225期。

法，用来指责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笔者以为，如果北大原来是一缸清水，那是怎么搅也搅不浑的。实际上，北大本来就是一缸浑水，只不过杂质都沉淀在缸底（各种问题被压下来了），表面看上去像是清水而已，工作队来了一搅，各种问题揭露出来，当然就浑了。

### 张子意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讲话

3月19日另外还有一个会议，即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作报告。实际上，中宣部自3月17日就直接抓工作队的工作了，但详情不得而知。

据《彭真传》，张子意在肯定前一段工作队成绩的同时，着重指出存在的缺点错误：一是三结合问题。按“二十三条”来检查，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没有实行“三结合”。“三结合”就是共同领导，可是调查组一开始就把北大党委撇在一边，摆着夺权的样子。二是批判面过宽，二十个总支书记批判了十八个，占百分之九十。如果其他学校都这样搞，能受得了吗？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各院校的领导和总支书记，按这样搞法，你们回去都得挨批判，你们受得了吗？所以书记处一再强调，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三是有的单位出现追逼、过火现象，有些场合混淆了敌我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敌我矛盾。四是唯成分问题要检查一下。五是“二十三条”下来一个时期，工作队无声无息。<sup>1</sup>

据龚育之的文章，张子意向全体北大社教工作队队员作报告，逐字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包括“北大社教运动要检查缺点错误”，“发展下去很危险”，“‘四清’运动要落脚到教学”，“批判要落脚到创作繁荣”，批判要“刹车”，点名要“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工作队一进厂、进校就要同原党委三结合”，等等，并据此对北大社教的错误讲了五条：一、对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二、没有三结合，夺了权，性质搞错了；三，打击面宽了；四，斗争方式过火；五，唯成份论。<sup>2</sup>

张子意讲话的全文无从查考，但他的讲话显然无法令人信服。比如他批评工作队没有

<sup>1</sup> 《彭真传》，第1142—1143页。

<sup>2</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190页。

搞“三结合”，当时的中央文件有哪一个说过工作队一进校就得搞“三结合”？再如他以“二十个总支书记批判了十八个，占百分之九十”来说明“批判面过宽”，也是没有道理的。笔者参加过农村“四清”，而且是在“二十三条”下达之后，生产大队的支书、大队长，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百分之百都要经受审查。经历一个揭发批判的阶段之后，再评定一个干部属于哪个类别：好的、比较好的，或者是有问题的。经过这个阶段，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就可以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了。真正定为“四类”、需要组织处理的干部，其比率是很低的，而且要到运动后期才会处理。运动初期经受“揭发批判”的干部比率，同运动后期受到组织处理的干部比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动初期受“揭发批判”的干部比率当然会比较高。至于把北大当作“夺权”的单位，还不是你张子意最先批示的？彭真不久前提出“把北大的全部领导干部系统地研究一次”，这算百分之多少？彭真还说过“并解决北大的领导问题”，这算不算“夺权”？至少，这和“三结合”不相干吧？

### 张磐石转不过弯来

上面的领导都转弯了，但张磐石转不过来。他当时的思想状况，笔者无从了解。他的认识，大概如陆定一所说，他认为他执行的完全符合“二十三条”。他的态度，按彭真后来所说，“磐石就是固执己见，把‘二十三条’、中央意见置之度外。”<sup>1</sup>这样，张磐石就非下台不可了。张磐石为什么转不过弯来，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张磐石认为，他的观点和做法，并不违背“二十三条”以前的中央文件，也不违背“二十三条”关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精神，而且，他的观点和做法，先前一直是得到上级的赞同和支持的。他就是转不过弯来，作为一个老干部，他不能公开上面的这些事情，但要他承担责任，他又不服气。他仍坚持他自己的看法。工作队党委的其他人（如刘仰峤）是什么态度，笔者不得而知。工作队员有二百多人，他们是什么态度，现在也无从细考。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人是想不通的。据西语系教师王

<sup>1</sup>《彭真在北大社教运动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1965年6月29日在人大礼堂小礼堂）。

××（曾为负责资料的工作队员）回忆，1965年1月24日万里代表市委向全市干部讲解“二十三条”，当时工作队内部讨论，对万里的报告提了不少意见，认为万里讲解“二十三条”是站在犯错误干部的立场的，对干部三结合的讲解不符合“二十三条”逐步结合的精神。1965年3月5日陆定一在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上宣布中央认为陆平是好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并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实际上，当时北大社教运动还远未进行到定案做结论的阶段，因而工作队和北大很多同志想不通“为什么北大问题还没有完全揭开就给陆平下定论呢？”工作队员和社教积极分子们想不通，但他们担心，“怕老想不通实际上就是反中央，故不坚持了。”<sup>1</sup>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彭真传》编者认为“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初步统一了思想”，<sup>2</sup>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张子意3月19日的报告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许多想不通的工作队员和社教积极分子不再坚持，是在“怕老想不通实际上就是反中央”这种心态下被压服的。而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并不满足于会议上的翻案和出气，他们还要“反攻倒算”。万里说过，“如果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就没有好结果，后患无穷。”后来的事实表明，万里的这句话，不幸而言中了。

### 北大局势短暂而脆弱的好转

尽管张磐石的思想转不过弯来，但北大的局势还是按照彭真2月15月批示中所说的他和陆定一商议的那个解决办法在发展。上文所述中央书记处会议、万里召集北大干部开会、陆定一向工作队作报告、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张子意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作报告，等等，大概都在那个解决办法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的措施还有：

3月21日，陆定一同陆平谈话，中心意思是给他放包袱。陆定一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书记还是要你做下去。名声不好了，这不要在乎，

<sup>1</sup> 王××的大字报，未署时间，据内容推测当在1966年8月之后。

<sup>2</sup> 《彭真传》，第1142页。

向同志们讲清楚就行了。陆平把这次谈话内容向校党委作了汇报，要求大家解除在社教中的隔阂，团结起来向前看。并说：社教运动中有的同志批判了别人，主要是基于革命的热情，被批判的同志应抱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3月25日，社教工作队党委和校党委共同召开全校参加运动的党员副处级以上干部会，传达张子意向工作队员作的报告。

3月26日，张磐石和陆平共同主持党员干部大会，由宋硕传达万里在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的讲话。全体工作队员、积极分子、校党委委员、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正副处长共九百人参加。张磐石、陆平都在会上讲了话。<sup>1</sup>张磐石、陆平的讲话内容，笔者不得而知。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影响下，按照《彭真传》编写者的评价，“北大的局势开始有所好转”。<sup>2</sup>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北大社教或许会有好一点的结局。但这个态势没有维持几天，就因为工作队副队长常溪萍的活动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迅速导致张磐石遭到批判并被免职。彭真、陆定一早先商议的那个解决办法中似乎并没有将张磐石赶下台的计划，常溪萍的活动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 常溪萍的活动推动张磐石被免职

常溪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他奉命带领的上海工作队员1964年11月20日到达北大。常溪萍随即担任北大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兼西语系工作组组长。他曾经就西语系的工作写过一份工作总结，张磐石用红笔在该总结上批了一个大“右”字，这使常溪萍很不服气。<sup>3</sup>

1965年春（疑指春节放假期间——引者），因为对北大社教的不同看法，常溪萍向上海市委作了口头汇报。第一次汇报是常溪萍向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

<sup>1</sup> 以上均见《彭真传》，第1143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43页。

<sup>3</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光两个人汇报的。张春桥对北大社教情况和分歧是非常清楚的，认为常溪萍提出的不同意见和向上级汇报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之后，常溪萍又书面向上海市委杨西光和张春桥写了两封信。他们再一次画圈同意。<sup>1</sup>上海市委居然插手北大社教，让笔者不胜惊讶。春节假期之后回到北大，常溪萍被安排到工作队队部，负责联系化学系和无线电系。

据北京市委干部庞××回忆，1965年3月中旬，常溪萍到北京市委大学部找宋硕，宋硕同他会见了万里。他告诉万里，上海市委告诉他，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北京市委，因此他到这里来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宋硕和常溪萍不断有联系。为避免被工作队发现，他们的联系都是做得很秘密的。<sup>2</sup>彭珮云回忆说：“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期间，有一天，宋硕很高兴地告诉我，常溪萍来找万里了，他感到北大社教运动有问题，找市委来谈是想了解市委对北大社教运动的看法。宋硕说他和万里把市委对北大社教运动的看法对常溪萍谈了，还对常说：市委领导北大这么多年，张磐石来搞运动，却把市委撇在一边。我记得宋硕还说过常溪萍来找市委，是背着别人一个人来的。”<sup>3</sup>

了解到北京市委的态度并得到支持后，常溪萍于3月17日给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和张子意写了一封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并希望派人检查张在北大的工作。这封信是通过什么途径寄送的，不详。现在有媒体说，这封信是“在上海市委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写成的，“不是个人行为，是组织行为”。<sup>4</sup>这就更令人惊讶了。3月20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谈了常溪萍，并写出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领导。在谈话中，常溪萍反映张磐石自“二十三条”公布以来，直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北大社教问题以后，对“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的错误态度、错误做法以及错误的工作作风。<sup>5</sup>

关于约谈的经过，常溪萍自己是这样说的：“3月19日（应为17日——引者）我给中央写了这封信，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在20日打电话来叫我去，接待我的是一位科长。我

<sup>1</sup> 《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www.wenxueloo.com](http://www.wenxueloo.com)，本文据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采访常溪萍秘书孙殿林、司机庞学友整理，责任编辑李树泉。

<sup>2</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3</sup> 彭珮云写的材料，1966年9月4日。

<sup>4</sup> 《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www.wenxueloo.com](http://www.wenxueloo.com)。

<sup>5</sup> 《彭真传》，第1143页。



去之前，带了这封信和社教工作总结汇报（这是可查的）。在和这位科长谈话中，我就是以这两份材料为主的，信和工作队总结汇报加了补充说明，谈过话之后，我把信交给了他，他说把总结给我看，我就交给他了（这份材料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第二天，中央机关派了一个同志来找我，我就到对面的宣传材料处借了一份交给他，没讲什么话，他就走了。”<sup>1</sup>

《北大百年》的作者认为：“常溪萍给中央提供了判处张磐石‘死刑’的材料”。<sup>2</sup>

1965年3月28日，彭真将常溪萍的信及谈话纪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在谈话纪要上写道：“直到最近，就是说‘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专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3月30日，邓小平在谈话纪要上批示：北大工作队负责人“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更换工作队的领导”，“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4月1日，彭真建议陆定一将常溪萍与中办同志的谈话纪要登《宣教动态》增刊。<sup>3</sup>

《北大百年》的作者称，“邓小平、彭真把张磐石逼到了死胡同，逼迫他迅速向北大党委及广大干部职工承认在北大所犯错误。”据该书记载，4月1日，社教工作队负责人与北大党委常委开会，张磐石说：中宣部负责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对北大运动很关心，周总理最近还问北大运动情况。领导同志说：北大工作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工作好坏还要影响到全国。中央书记处要北大作出个总结来，供全国参考。张磐石还说：中央讲了，陆平同志是好同志有某些错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大家是有共同语言的。校内的工作要靠常委、靠陆平同志。<sup>4</sup>

张磐石的命运已被决定，在压力之下言不由衷的表态已经毫无意义了。

### 民族饭店会议对张磐石的批判，张磐石去职

<sup>1</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2</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6页。

<sup>3</sup> 《彭真年谱》，第409页。

<sup>4</sup> 李志伟：《北大百年》，第317页。

在彭真和邓小平相继做出批示之后，1965年4月2日，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史称“民族饭店会议”。对这次会议，中宣部高层是如何商议的，不得而知。这次会议并非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会议，与会人数仅五六十人。会议历时约20多天。据常溪萍回忆，会议开到5月1日才结束。<sup>1</sup>会议有11人领导小组，彭珮云参加，常溪萍也成为领导小组成员。其他成员待考，常溪萍称“陆、彭参加”，<sup>2</sup>当是指陆平和彭珮云，但陆平说他并未参加会议，<sup>3</sup>但陆平在4月29日是作过一个报告的。庞××回忆，“这次会议宋硕自始至终参加了的，这是彭真指定他参加的，他实际上是以彭真代表的资格来参加这个会的。”<sup>4</sup>

“民族饭店会议”的目的，名义上说是检查、总结工作队的工作，实际上是对张磐石进行清算，并要求工作队的骨干转弯子，同张磐石划清界限。

会议印发了常溪萍的信和谈话纪要，以及邓小平和彭真的批语，还印发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这都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文件，也是召开“民族饭店会议”的基础。常溪萍的信在文革中曾经传出，但谈话纪要，笔者未曾见过。

据龚育之的记述，张子意作了会议开幕词，传达了彭真此前的指示意见：北大社教运动违背了延安整风的精神，要求通过这次会议，通过纠正北大的过火斗争，使延安整风以来的党内斗争好传统在北大传下去，在全国高等学校传下去，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传下去。4月6日，张子意在会议领导小组上历述中宣部为贯彻中央精神所做的工作，特别说：今天当着同志们的面，告诉大家，“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这个话，是毛主席讲的。张子意对于工作队里同“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精神顶牛的现象和言论，作了严厉的批评。<sup>5</sup>

据龚育之，1965年4月28日到29日，会议扩大为全体工作队员大会。陆定一、张子

<sup>1</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2</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3</sup> 陆平写的材料，1966年9月17日。

<sup>4</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5</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190页。

意、许立群总结北大社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工作队长拒不执行“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错误。<sup>1</sup>陆定一宣布：撤销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北大社教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增加常溪萍为北大社教运动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员由8人增加到9人。<sup>2</sup>

对于张磐石的错误，会议没有正式文字通知。

会议期间，常溪萍除了大会发言外，还以领导小组成员身份在多个小组会上发言。他到处游说，“你们应当赶快转弯，不要跟张磐石跑，要同张磐石划清界限。你们是认识问题，和张磐石不一样，如果你们还不转弯，那就不是一般认识问题了，就是组织上政治上的错误了。”在会议中谁要反对常溪萍，就会被扣上反对中央领导、反对中央书记处指示的帽子。<sup>3</sup>

工作队成立了新的领导小组，其成员是：许立群、陆平、戈华、彭珮云、常溪萍、宋硕、刘仰峤、侯西斌、庞达。<sup>4</sup>至此，北大社教运动的张磐石时期宣告结束。

“民族饭店会议”上陆定一、张子意、许立群、陆平四人讲话的录音后来在北大党内播放过，但笔者不了解其内容。

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大部分队员都没有参加座谈会，校内借调至工作队的人员更没有资格参加。据说有部分留校的工作队员和少数积极分子也学习了大会文件、报告，领会精神进行总结和检讨，但多数人对会议的情况是不甚了解的。“民族饭店会议”的最后两天才是全体工作队员的大会。李清崑回忆说：“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是开大会批判张磐石，大约是为了使我们受教育，包括我在内校内借调到工作队的人员也都参加了。大会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主持。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张磐石的有工作队的干部，也有中宣部、高教部参加工作队的干部，看样子都作了充分准备。而张磐石则坐在主席台上右手托腮，只听不记，散会时拂袖而去，表现出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参加这次大会后，我很有感慨。据

<sup>1</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190页。

<sup>2</sup> 《彭真传》，第1144页。

<sup>3</sup> 聂元梓、孔繁等17人的大字报《关于常溪萍的材料（大字报）》，1966年9月20日。

<sup>4</sup>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412页

我所知，张磐石每周六回中宣部后，多向张子意常务副部长及部领导汇报工作，听取意见。张子意等也多有指示。他们周一返回北大后每次都在各工作组长会议上传达，我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也列席会议听过传达，未听到部领导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怎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就一股脑儿把错误全推到了张磐石的身上？尤其是常务部长张子意（据中宣部的人说是个行政三级的老红军高干）在最后总结发言时，大批特批张磐石。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在高层领导之间还有这等事情。”<sup>1</sup>

据北京市委干部庞××回忆，陆平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是宋硕帮助准备的。商议这件事时，庞××正好在场，“宋硕帮助陆平准备发言时，提出过两条意见。一是要陆平空洞地肯定一下社教运动的成绩，说什么社教运动的成绩必须坚决肯定等等。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肯定。一是要陆平空洞地对运动中群众对他的揭发表示一下态度，说什么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无论对的错的，对他都有很大教益等等。表面上看起来态度很好，实际上是安了钉子。”<sup>2</sup>

## 五 在各方博弈之下，北大社教运动终成烂尾工程

张磐石被搬倒了，新的领导小组成立了，那么，北大社教运动可以正常地开展起来了么？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常溪萍参加了九人领导小组，“二十三条”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执行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而且，常溪萍还迅速陷入了无法言说的困境之中。请看常溪萍自己的说法。

### 常溪萍谈九人小组

1966年8月30日，常溪萍在华东师范大学文革代表大会上说：“回来以后（指民族饭店会议结束后回到北大——引者），同志们要我起草一份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总结了八条成绩，但许立群不满意，但不能否定这一点，只好勉强同意。”<sup>3</sup>

<sup>1</sup> 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记忆》2018年5月31日第225期。

<sup>2</sup> 参见庞××1967年3月写的材料。

<sup>3</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常溪萍反对张磐石的工作作风，反对张磐石不执行“二十三条”，但不主张全盘否定北大社教，还要摆出八条成绩，要完全否定北大社教的许立群当然不会满意了。

参加九人小组后，常溪萍每天都要同许立群，宋硕、陆平、彭珮云等人打交道了，现实情况很快就给他浇了一盆凉水。常溪萍说，“以前我跟这些人接触不多，在5月2日后和他们接触多了，发现了他们的问题。这些人口头上讲的好听，要执行‘二十三条’，而在行动上实行欺骗，阳奉阴违，直接违背主席指示和‘二十三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整工作队，以后整积极分子，而不是牛鬼蛇神。当时工作队、积极分子很不满意。”“九人小组开会，总是许、彭、宋、陆四人先开，再拿到会上讨论，会上一唱一和，互相吹捧，彭珮云只有30几岁，是××的亲信，许在开会前首先听了彭珮云的意见，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注意，对他的作法表示反感。”“他们扬言工作队、积极分子要用开水泡”，“还说什么，北大揭发问题要‘一风吹’，提的意见要‘一火烧’。北大的材料要消掉，要工作组肯定总支领导正确，肯定陆平的成绩。我感到发现了问题，但不敢坚持。”“到九人小组以后才慢慢发现问题，作了一些斗争，但不够。”<sup>1</sup>

常溪萍多少为工作队的人说了点话。常溪萍说：“许立群、彭珮云等人打击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个工作组长平时表现较好，在九人小组讨论他时，被说得一无是处，我了解情况不是这样，我给许立群指出，这位同志是好同志，表现较好，这时彭珮云进行挑拨离间，对这个同志说我在九人小组面前告他的状，使这个同志对我不满，后来交了心，才解开这个谜。”<sup>2</sup>另据彭珮云所述，东语系工作组向被斗争对象赔礼道歉时，积极分子认为他们的检查太过分了，而另一方面的黄××等人又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一定要工作组承认把东语系当烂掉的单位搞了，把他们的问题性质搞错了。常溪萍向陆平和彭珮云提出，东语系工作组在运动中是受张磐石批评的，他们没有把贺××、黄××等人的性质搞错。陆平表示尊重常溪萍的意见，就让彭珮云告诉黄××等人不要再和工作组争了。<sup>3</sup>

<sup>1</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2</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3</sup> 参见彭珮云1966年9月4日写的材料。

从“民族饭店会议”结束到7月份工作队离校，九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大社教有两个月之久。在这两个月里，主要是“清算”北大社教运动第一阶段的工作，工作组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得作检讨，同张磐石划清界限，向被批判的对象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直到被批判对象满意为止。常溪萍也积极带头在好几个系里作了检讨。常溪萍刚来北大时曾任西语系工作组组长，作过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来也为此作过检查。令常没有想到的是，他在西语系的报告会遭到通报批评。常溪萍说：“在我临走时他们干了我一下，歪曲地印发了我在西语系的有关阶级斗争的报告，断章取义地把工农同学丑化，在北大通报批评我，我还是第一个。我发了言说根本不是这样，我有意见，我要求重新再校对笔记，对比材料。我把书面的东西给了他们，不知其承认了还是否认了，后来我就回上海了。”<sup>1</sup>

看来，常溪萍同陆平、彭珮云等人的分歧确实存在。所以后来许立群要调常溪萍当高教部副部长时，常没有接受。常溪萍说：“得到消息要我到高教部工作，我知道高教部与他们是一条线，我认为到高教部去工作很危险，这样搞下去不知道搞到一个什么后果。”<sup>2</sup>许立群还打电话要常溪萍参加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常“感到苗头危险”，就以工作忙走不开为由推掉了。常溪萍也被吸收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但实际上没有参加会议。常溪萍从1965年7月10日回上海后，再未回北京。<sup>3</sup>

常溪萍曾对彭珮云说，他对陆平的印象很好，陆平虽然在运动中受了许多批评，但是风格高，态度好。<sup>4</sup>在实际工作中，常溪萍也极力为陆平说好话，为其辩护。但后来在华东师大的大会上，常又解释说：“陆平这个家伙很狡猾，与彭珮云不一样，我们在当时认为他比彭珮云好一些，对他产生了麻痹。我与他们不一样，有分歧。”<sup>5</sup>

### “把运动落脚到改进教学工作”成为空话

<sup>1</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2</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3</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sup>4</sup> 彭珮云1966年9月4日写的材料。

<sup>5</sup> 参见“常溪萍在华东师大文革代表大会上的检查”，1966年8月30日。

3月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强调学校要抓紧教学工作。据《彭真传》，邓小平批评说：“运动搞了几个月，也没有落脚到教学上。”据《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强调：“运动的方向要转到落实教学，调动教职员积极性方面。”彭真在会议上也说，要“把运动落脚到改进教学工作”。这些讲话并未得到执行，笔者作为当时的在校学生，完全没有感觉到教学工作有什么起色。1965年9月底，数千师生下乡参加“四清”，学校领导层忙于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所谓“改进教学工作”，完全成为空话。

### 社教工作队撤离，北大社教运动烂尾

据聂元梓1965年11月15日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关于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现阶段的情况和问题》，陆定一在4月29日的报告中讲过：“北大四清运动有错误也有成绩，不能因为错误就否定成绩。”陆定一还指出5、6月份运动应做的几件事：“（1）已经揭发的问题，要加以核实，是即是，非即非，部分对的就部分对，部分错的就部分错，要加以分析处理。没揭发的问题也应该继续揭发处理。（2）校系一级领导核心，应补充调整，好办事情。并说，这是小平同志说的。（3）到一定时候，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供各地参考，运动中有的问题，有普遍性。”陆定一最后又指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落实到学校教育、学校管理工作。以上三件做完，6月份后再研究落实到教学管理工作。”<sup>1</sup>

陆定一的这些指示得到执行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新上任的许立群，说话也是不灵的。聂元梓在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中写道：

“5月初，许立群同志来校领导运动，5月7日报告中讲了如何抓教学秩序的工作，要学校来做，工作队主要多抓贯彻党的团结的工作，学习四个录音报告（定一、子意、许立群、陆平同志在4月29日报告），认清张磐石同志的错误，在全校党内纠正运动中的错误。让被批评的同志畅所欲言提意见，工作队员、积极分子学习报告联系运动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检讨。最后对运动中的问题工作队做出总结性的检讨向被批判人道歉，请被批判人再提

<sup>1</sup> 聂元梓：《关于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现阶段的情况和问题》，1965年11月15日。

意见。这样做，本来并没有计划用很长时间（可能是计划两周）；而且，许立群同志在5月12日、5月14日的讲话中也指出了：有的人还余怒难消，要讲一讲，我们还是好好地听。但是，从领导上讲，再提倡‘出气’就不适当了。因为情况变了，工作队领导人已经被撤职了，工作队的错误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同志们有气也该消了。”

聂元梓指出：“实际上这一段运动（5、6月份）并没有很好地执行定一同志4月29日的指示，也没有执行许立群同志的指示，运动并没有前进，仍是被批判的同志提意见，工作队、积极分子一直在检讨。”<sup>1</sup>

对于这种做法，许多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显然是想不通和难以接受的。于是，领导层决定将社教工作队撤走。

聂元梓在上书中写的是：“6月29日以前，九人小组提出建议，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四清运动暂停，外调工作队员返回原单位，学校工作忙，要集中做好学期末和下学期开学的准备工作，还要准备做好下乡参加四清的工作。本校四清运动何时开始未定。6月29日，彭真同志向全体工作队员作报告。听完报告后，外调工作队员离校。”<sup>2</sup>这是比较准确的记述，如常溪萍就是在7月10日走的。

李清崑回忆：“大约在1965年6月上旬（似应为7月一引者），北大社教工作队决定放假，工作队员全部回原单位，暑假后还要返回北大搞社教运动。名曰‘放假’。实际上是把工作队解散了，终止了北大社教运动。在社教工作队撤离北大时，一些好心的工作队员对社教积极分子说：‘我们要走了，后面可能要整你们了，要有思想准备。’我因借调到工作队办公室工作，副队长刘仰峤又分管办公室，同他接触较多。他在临走前也同我打招呼，说运动搞过了头，责任在工作队，你们可能会受到牵连，要想得开。”<sup>3</sup>北大的工作队员都是中、高级干部，富有党内斗争经验。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来由的。

无论是“暂停”还是“放假”，工作队一去不回，但社教工作队和九人领导小组在名

<sup>1</sup> 聂元梓：《关于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现阶段的情况和问题》，1965年11月15日。

<sup>2</sup> 聂元梓：《关于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现阶段的情况和问题》，1965年11月15日

<sup>3</sup> 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记忆》2018年5月31日第225期。



义上还存在（虽然常溪萍走后再没有参加会议），还可以用这个名义发号施令。

### 彭真6月29日的报告

6月29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报告很长，讲了8个问题，全文约1.5万多字。《彭真文选》未收录，《彭真年谱》对此报告的摘录约1千余字，《彭真传》摘录约1千字，龚育之文章中的摘录约2千字。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摘录。

多年后，龚育之在回顾这篇报告时承认：“这篇讲话虽然还按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讲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却完全没有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重点放在不能说陆平是走资派，不能说那么多校系干部是走资派，不能说全国全党有那么多走资派。通篇讲话的着力点，是贯彻《二十三条》纠‘左’或可以被用来纠‘左’的精神和条文。”<sup>1</sup>

张磐石的主要错误是不执行“二十三条”，没有从一开始就搞“三结合”，其实，彭真也没有真正执行“二十三条”。如龚育之指出的，彭真完全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充分地利用“二十三条”中纠“左”或可以被用来纠“左”的精神和条文。但是，无论是张磐石的工作队员，还是北大的党员积极分子，谁也没有看出这一点。工作队员们灰心丧气，只望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党员积极分子关心的是，他们会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会不会挨整。聂元梓数十年后回忆彭真的这次讲话时说：“我记得十分清楚的一句话，彭真说：‘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sup>2</sup>聂元梓回忆说：“这个会开过后，被动员起来给校系领导工作提意见的人，感到杀气腾腾。回想起四月二十八日（日期疑有误——引者），工作队员以放暑假的名义离开北大时，找他们动员起来提意见的积极分子谈话，也找了我，说：我们

<sup>1</sup> 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194页。


<sup>2</sup>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87页。

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当时还不太理解，这时真的验证了。”<sup>1</sup>李清崑回忆说，“据我了解，当时社教积极分子普遍有很大顾虑，认为要轮到我们挨整了。因而听彭真报告时特别注意他对积极分子的态度。当他讲到：有人说‘怕打击报复’，‘如果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就打击不得？兴无灭资，资产阶级思想要灭，就打击不得？’时，积极分子们的顾虑就更大了，大有‘在劫难逃’之感，抵触情绪也更大了。”<sup>2</sup>

北大社教运动最终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它不仅没有解决北大原有的问题，总结出什么高校社教的“经验”或“文件”，反而激化了矛盾，加深了分歧，演变为一场“交锋激烈、反复无常的拉锯战。”（陈徒手语）

全国最高级别工作队领导的北大社教运动以烂尾告终，但问题依然存在。工作队刚散摊子，“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议”就来了。党员教师们连暑假都没有过成，据说这一年的招生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而长达7个月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更是将社教运动带向了“文革”的深渊。这不仅是北大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

北大社教运动还夹杂着一个批判冯定的运动，因头绪纷繁，本文没有涉及，俟另文探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也是需要探讨的，那将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

彭真对“二十三条”的态度，毛泽东洞若观火。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到，“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sup>3</sup>毛泽东对“中央的第一线”有了看法，彭真首当其冲。彭真6月29日作上述报告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在紧张的写作中了（据说文章的第一稿就是在五六月间完成的）。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sup>1</sup>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第87页。

<sup>2</sup> 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载《记忆》2018年5月31日第225期。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六卷，第9页。

【考证】

## 文革中北大与地院关系考略

舒 声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与北京地质学院（简称地院）在文革中是表现十分突出的高校，两校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和复杂。近年来，两校的文革史研究都有了很大进展。根据已经挖掘出来的史料，考证一下两校在文革中的关系，对北京高校文革史的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

### 一 文革初期，北大支持地院反工作组

1966年6月初，毛泽东下令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地质部派出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地院。6月20日，地院爆发了反工作组的游行，这应该是北京高校最早的反工作组的公开行动，但在薄一波的支持下，地质部和工作组很快就进行了反扑，搞了一场所谓的“反干扰运动”，对反工作组的群众进行镇压，地院处于“白色恐怖”之中。7月25日、26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来到北大，主持了全校辩论大会，宣布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建议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起来闹革命。地院反工作组的学生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北大经济系64级学生，立即将这个信息传给了他哥哥。还有一位北大地质地理系64级的学生何西平，混入地院，到探工系71641班，找到他的广东同乡古宝琳（后成为王大宾妻子），讲了北大情况，而王大宾1964年开学时当过古宝琳这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也很快听到北大的消息，深受鼓舞，想到北大找聂元梓取经。

王大宾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7月27日，我与11632班的周永璋、伏庆是，11622班的殷维侯，15632班的蔡新平、杜金山、庄一龙相约，去北大找聂元梓取经。我是翻过学院西边的围墙，逃出地院的。我们在约定的地方汇合后，就直奔北京大学。我们要去北

大打听消息，了解中央文革对工作组的态度。我们都想在北大能亲自见到聂元梓。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聂元梓是一个得到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大左派，她说的话，她介绍的情况应是可信的。

到了北大，好不容易才找到聂元梓。那时找她求见的人特别多，一拨一拨的。聂元梓见到我们，得知我们是地质学院的，很热情，马上请我们到她的办公室坐，很耐心地认真听我们介绍地院文革运动的情况，听我们讲工作组如何打压我们，我坐在聂元梓旁边打量她，觉得她年龄可能比我母亲还大，没有一点我想像中泼辣、敢打敢冲的英雄形象，只是一个平常的普通的中年妇女的样子。聂元梓听完我们的介绍，就向我们讲了江青、陈伯达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组，讲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聂元梓还表示支持我们反工作组的行动，并答应我们的请求，将地院文革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汇报。

见到聂元梓，听了聂元梓讲话，得到了她的支持，我们非常高兴，大受鼓舞。我们急着返回地院，要讲我们见到聂元梓的情况，聂元梓介绍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精神，聂元梓对我们批评工作组的支援，告诉地院的广大师生员工。回到地院，我们马上议定内容，由殷维侯执笔，写好《走访北大的声明》，由我们七个同学签名，用大字报抄写贴到了北五楼底的保卫处大门外的墙上。大字报一贴出即引起轰动，观者云集。从聂元梓处得到的咨询，95%的工作组犯了错误，工作组也可以批判，饱受压制打击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大受鼓舞，看到了翻身的曙光<sup>2</sup>。（王大宾著，《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 年出版，17-18 页）

地院地质系 63 级学生，曾任地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革委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的伏庆是也有同样的回忆：“某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前往北大。我们在北大哲学楼前面见到了聂元梓。她被人们包围和簇拥着，不停地讲着话，像是演讲，又像是回答人们的问题，我在一旁仔细地端详她，想看看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究竟是何等人物。当时正当盛夏，聂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大约 40 多岁年纪，面色白皙，短发，戴一

付浅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地道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模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仿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们挤到她身边，说明来意，她让我们到哲学楼一层的一间办公室详谈，她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已记不清，只记得她向我们透露，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sup>3</sup>（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第84页）

从王大宾和伏庆是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文革初期反工作组的斗争中，地院造反派是得到了北大和聂元梓的支持的，而且这一支持给了地院造反派很大的鼓舞。

## 二 民族宫事件，《地院东方红》与《新北大公社》闹翻

1967年2月22日，首都高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根据中央文革的安排，聂元梓任核心组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任副组长，但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互不服气，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他们各自领导的组织在社会上夺权，插手其他单位的运动，经常发生冲突。1967年4月8日，在民族文化宫，发生了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和新北大公社之间的剧烈冲突，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民族宫事件”。

所谓民族宫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二月逆流”，在反“二月逆流”中，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从批判“全国农业展览”入手，揪出了谭震林，而新北大公社在批判谭震林中显得落后了，他们也想效仿北师大，到民族宫去批判“民族工作展览”。4月初，聂元梓派出50多人，进驻民族宫，与“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一起，说民族宫的展览有问题，要进馆造反，要将部分展览材料拿走。此时，已经掌权的“民族宫东方红公社”请示上级后，中央文革指示：民族宫展览先不要动，待后处理，对批判展览，已有统一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拒绝新北大公社的人员进馆，后者就锯断了综合馆大门的铁锁，强行进入展览馆。地院东方红总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支持民族宫东方红公社，派人前往民族宫，将进入馆内的新北大公社人员赶了出去，中间发生了撕扯。新北大公社不甘示弱，立即调

自己的人和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的人前往，随着事态的发展，双方调来的人越来越多，地院调来的人，主要是原三司院校的人，包括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邮电学院东方红、农机学院、林业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单位的人员；而北大调来的人包括民族学院抗大公社、石油学院抗大公社、北外红旗大队、化工学院一月风暴按十六条革命战斗队等单位。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几乎就是后来形成的天地两派的一场斗争的大演练。

当天下午6点，聂元梓和蒯大富商量起草了“红代会的两项命令”：

#### 红代会两项命令

- 一、红代会所属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绝对不许武斗，目前双方离开民族宫、民委，不得接触（包括所有矛盾双方，而本机关除外）。
  - 二、双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转移，不准销毁，暂时保留在持材料者手中。
- 有矛盾由红代会主持协商解决。

红代会委员会聂元梓、蒯大富

4月8日下午6点

但地院东方红等单位的人员不买聂蒯的账，认为他们不能代表红代会。晚九点，地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

####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严正声明

于四月八日下午六点，红代会委员会聂元梓、蒯大富发表所谓两项命令，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特发布严正声明：

- 一、红代会聂元梓、蒯大富发表的两项命令根本没有经过全体常委的讨论，更没有经过全体委员的讨论，丝毫没有是非观念，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此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完全不承认此命令，也根本不执行这项命令。

三、由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聂元梓、蒯大富两人负完全责任。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晚九点

双方僵持到第二天凌晨，中央文革派人派调停，北大和地院等单位的人员才陆续撤离现场。

### 三 1967年4月11日，在北大发生严重的冲突

民族宫事件在继续发酵。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等去北大会见了聂元梓，并向她说明了情况，双方以“误会”暂时平息了事端。但北大校园里却展出了“4.8事件”被撕破的衣服等实物及文字材料，极力扩大事态。地院东方红得知情况后，派出广播车进入北大，进行反驳，结果广播车被砸，人员受伤。

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人再次去北大，他们不仅没有找到聂元梓，反倒被“新北大公社”人员包围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逃回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带回。此时激怒了地院东方红和其他部分学校。地院、农大、农机、邮电、政法、北工大、林院等校立即派出广播车和大批人员去北大增援。一开始，北大关闭了东门，不让他们进入。陈宝堂等翻墙进入，打开大门，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和新北大公社发生冲突，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流血事件。进入北大的地院等学校的人员，在北大操场召开大会，“控诉”新北大公社的暴行。

此事一直延续到4月12日下午，由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向双方传达中央文革的紧急通知才平息下来。紧急通知如下：

革命的同志，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谢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派来的，现在宣布一个

经过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的，由谢富治、傅崇碧同志签署的紧急通知。全文如下：

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新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十一日夜间和十二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到自己的学校。

谢富治、傅崇碧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七时半

此后，地院等校的人员撤出了北大。但聂元梓、孙蓬一等怀疑谢富治是地派的后台，孙蓬一于当天晚上在北大大饭厅发表了著名的4.12讲话，矛头直指“摘桃派”和谢富治。从此北京高校天地两派的争斗更加公开化、白热化。

#### 四 地院东方红支持北大井冈山

1967年春季以来，北大陆续成立了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8月17日，这五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在五四运动场召开了成立大会，得到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几十家地派组织的支持，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也派代表参加并写了祝贺信。井冈山兵团一成立，即被吸收成为“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红代会还发表声明，宣布恢复被开除了的北大老“井冈山”的红代会成员资格。从此北大出现了两大群众组织对立的局面。而北大井冈山一直得到地院东方红的支持。

1968年3月29日凌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下属组织新北大公社，为了消灭反对派的力量，从31楼发动武斗，驱赶井冈山兵团的学生，大批井冈山学生外逃，部分井冈山兵团的学生被包围在28、30、32、35、36、37楼，并架天桥、挖地道，形成了校园内小范围的割据局面。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依仗自己掌权的优势，对井冈山展开围攻，断水断电、



封闭校园、停发助学金和粮票，并在校内外肆意抓捕井冈山学生和支持井冈山的干部、教师，私设监狱，关押井冈山的成员，打死三人(含地院附中学生1人)、打伤致残多人。

武斗期间，不少北大井冈山的成员逃到地院，地院成了北大井冈山的避难所和后方基地。笔者1968年5月来到地院避难，看到约有数百人在地院居住，基本都住在教室里，晚上睡在课桌上，白天在学生食堂吃饭。地院校医院里住着不少北大井冈山的伤员，还成立了宣传组（负责人雷祯孝等），印刷了大量传单，张贴到各大高校和城里街道上，控诉聂元梓镇压群众的罪行，并到处寻求支援，采购了一些粮食蔬菜等，夜间运到北大37楼墙外的豁口，送给在校内守楼的同学。地院和地派的北京农业大学等学校，以及部分支持地派的工人、农民和海淀镇的居民，都给予了北大井冈山一定的物质支援。笔者还看到在五道口附近的铁路边，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互相交换“俘虏”的场面。一直到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武斗停止，井冈山的人员才全部撤出地院，回到自己的校园。

## 五 聂元梓暗中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反对派

与地院东方红支持北大井冈山相同，聂元梓也支持地院东方红反对派，但不同的是，地院东方红支持北大井冈山是公开的，而聂元梓支持地院东方红的反对派是暗中进行的。

据曾任地院革委会副主任的聂树人回忆：1967年9月4日，晚上10点多种，我当时的住地学12楼楼顶上突然响起了宏大而清脆的广播喇叭声。楼顶究竟有几个喇叭我不得而知，我虽然住在这座楼上，但是，对楼上的住户们并不了解。

“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开始广播！”

“为了忠实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彻底批判朱成昭的反动观点，把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宣布，北京地质学院大批判广播台现在正式开始广播……”

我的第一反应是“二团”即“蔡派”，已经将内部的分裂公开化，要公开打出分裂的

旗号。他们一直指责革委会不批判或假批判朱成昭，只有他们才是真批判朱成昭，而他们的批判又收到革委会的压制。

当晚，这个“大批判广播台”被以物探系为主的学生砸了。第二天，在小汤山养病的地质学院东方红一把手王大宾回到了学校，召集革委会常委开会。当王大宾听到参加常委会的广播台同志说，二团所使用的广播器材上用红漆写着“北大广播台”的字样后，他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才感到“二团”的后面站着天派。于是，他在会上大骂聂元梓是臭婆娘。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233、242，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内部的反对派蔡新平自己也承认：我跟聂元梓也不错，我被地质学院打出来后就住在北大的专家楼，我就在那儿住很长时间。王大宾抓我的时候，就出来一帮人保护我。（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6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1）。除了蔡新平，还有殷惟侯等一些“二团”的人员也在北大避难。（前书，311、327页）。北大专家楼位于未名湖北边，是当时北大食宿条件最好的地方，可见聂元梓对地院反对派的优待。

## 六 有关人士对天派、地派的认识和评论

文革中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和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说：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王大宾不同意吴德的说法，2015年，王大宾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天派、地派历史的事实，无论是北大、清华、北航，还是地院、师大，以及北京所有高校的反工作组造反派组织，能由受打压的少数派发展为多数派，都是毛泽东支持的结果，其出面具体执行毛主

席决策的是周总理与中央文革的成员。文革运动发展过程中，上层后来发生了矛盾，我们都是不知情的，这些人把自己说成先知先觉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王大宾回忆录，134-135，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5. 10）

2013年，聂树人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原三司院校对聂元梓、蒯大富等独霸红代会的不满，原三司造反派对以聂元梓为首的保皇派对北京市造反成果的篡夺不满，这才是天、地两派争斗的实质。因此，地派院校学生冲入北大，向聂元梓、蒯大富，特别是向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天经地义。地派院校唯一的错误是冲入北大，打到人家家里去了。”（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15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1）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江青他们支持地派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地派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则处处受到排斥和冷遇……，还有，我从来不接受所谓天派、地派的划分，也不接受“五大领袖”的提法。所谓天派、地派是很模糊的。其实，北大、清华、北航，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派系，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都没有在一起串联或者开过任何天派的会议，相反地，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有分歧的，各有各的观点，意见和行动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五大领袖”的帽子，当时我就不同意，我不是领袖，我不是拉群众搞派性，我就是根据党中央《五一六通知》，根据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指示，参加文化大革命，谈何领袖？（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210-211，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吴德的回忆是不够准确的，天派并不是以聂元梓为首，蒯大富和韩爱晶也不是动摇在两边。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的回忆，很大程度还停留在文革思维中，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指责对方是在后台操纵下的组织，而对自己的错误则很少提到，或轻描淡写，或百般辩解，缺乏深刻的认识。笔者认为，既然文化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文革中的各派群众组织的行动都是在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指示、领导下进行的，总体上也都是错误的。北大和地院，文革初期本来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后来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可以辩论或通过协商解决，而不应采取过分极端的行动，如新北大

公社锯开民族宫的门锁，抢走展会资料，地派成员开车派人冲入北大校园，都是十分过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两校头头互相支持对方的反对派，更是加剧了对方内部两派的矛盾。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在掌权后，容不得不同意见的群众，采取压制、镇压的手段，更是极端错误的。北大和清华，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导致无辜群众死亡、受伤，引起广大群众反感，导致最高领导人震怒，对学生造反派失望，派出工人解放军进驻学校，夺去了造反派的领导权。虽然这些造反派头头是在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参与文革活动的，但他们在掌权后利令智昏，倒行逆施，以致走向反面，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他人。文革后，无论天派还是地派的头头，都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如今，他们已垂垂老矣，在回顾自己的历史经历时，应诚实记录当时发生事件的真相，认真进行反思，承担自己的责任，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和深刻教训。倘能如此，或许能够得到当时受害者的谅解，也算对文革历史研究做出点贡献；如若继续坚持文革思维，掩盖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开脱，甚至企图翻案，那就更加可悲，将会永远被历史和后人所不齿和唾弃。🔒

【述 往】

## 情系科大：岁月淌不尽的希望（上）

周 平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不是由於我们不聪明，也不是由於我们不勤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这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族的侵略。文化大革命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作者题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在北京西单出现了一张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的大字报，\它曾经被传抄，复印，流传到全国，美国之音也曾做过报道。这颗小小的流星，在那黑暗的天空中仅仅闪烁了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而我和我的同伴们却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燃烧了自己，却没有照亮世界。几天以后，这张大字报的几位作者被关进了监狱……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关心地问：这张文化革命中著名大字报的作者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

### 序曲：迟到的学位

波多玛克河象一条绿色的缎带，蜿蜒地流过华盛顿特区的西南端。它是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把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分开。华盛顿特区的标志就是那屹立在市中心广场的华盛顿纪念碑。登上纪念碑顶部向四面望去，这座城市的雄姿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的东面是国会大厦，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北面是白宫。广场上的这三位伟人为建立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生前人们的颂扬，而在于历史的评价和后人的理解。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殖民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他以身作则，建立了国家总统的任期轮换制度，杰弗逊是美国宪法的作者之一，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一种永恒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和基本的人权，直到今天，这部宪法仍然是制定各项法律 and 政策的依据和经典，是美国高中英语课本的重要一课。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农奴制度，向着种族平等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绩就象这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流芳千古，与日增辉。正是这三位伟人所奠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和活力，在过去的百年中，美国出了二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造就了象贝尔，福特，比尔盖兹这一代代风云人物。为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春天又来了，华盛顿的五月是多麼迷人，鲜花似锦，绿草如茵，连泥土也洋溢着春意，



空气也弥散着芳香。1994年五月，George Washiongton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白宫和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举行。这一天是我们到美国后最‘风光’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长亲授绶带。

这场面本来就够壮观的，再加上这一年学校请到（周平、杨恒祥夫妇同获博士学位时的留影）第一夫人海拉蕊柯林顿作为客座讲演人，许多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属老早就赶到这里，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她讲演的题目是“家庭价值和教育(family Value and Education)”，海拉蕊柯林顿不愧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辩的口才，清晰，严谨而有吸引力的讲演激起广场上一阵阵欢呼。

作为新移民，我深深体会到家庭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段开场白：

八年前当我刚刚来到这块新大陆，我听到一句著名的格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都具有生与俱来的平等权利)这是美国宪法的灵魂，也是美国社会成功的秘诀之一。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国梦就是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并为我的孩子们提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机会。我坚信教育是新移民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光明之路。

我选择了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了人类现代的文明，在科学面前，没有虚伪和权势，在科学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科学代表了真理，进步和光明。

我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她为我们这个来自东方的贫困家庭两代四口人提供了奖学金，帮助我们完成学业。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和学习了八年，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学习了科学，而且学习了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教育给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获得在这个社会竞争和生存

的能力，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教育给了我的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一年，我已49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龄最大的毕业生，但我和祥确实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最大的夫妻档。看着这欢腾的人群，坐在身边的祥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到exciting，我觉得我们只是得到了老早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是的，这个学位对我们是太迟了，为了我们的梦，我们追寻了三十年，从中国到了美国，从北京到了华盛顿。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不是由于我们不聪明，也不是由于我们不勤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科学史上的断层，作为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出象李远哲、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大师，这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族的侵略。文化大革命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我们这一代人被后人看很傻，也很迂腐。是的，我们受过欺骗，我们犯过许多错误，做过许多愚蠢的事情，我们承受了历史的苦难，经历过人生的艰辛。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我们曾经思考过，曾经努力追寻过。我们这一代人将逐渐走出历史，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使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聪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经历。

## 第一章 从天之骄子到现行反革命



1964年八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

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

1966年六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十二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付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象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关于文化革命的目的，并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的公开信。听说他们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勇气和他们深刻的思想和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真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些观点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 XX，近代物理系学生冯 XX 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当时我们起草时，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的基调是文化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后来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一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



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 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元月五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有点象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我们那时真是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作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当时有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和亲友都私下告诫我们，“不要忘了57年反右派的经验教训。”我那时那里听得进这些逆耳忠言，觉得他们是老迂腐，没有认清大形势，胆小怕事。我还对我们的人说现在是文化革命，和57年反右派时的形势不同，言论自由，谁都可以批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在我这个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象解一道数学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一定的答案。后来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和后果，更没有想到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1967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XX、冯XX、我、江XX、黄XX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年纪轻轻的大

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还不明白，我还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当软骨头。我想的是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进来以后，我慢慢了解到，这里关押有许多名人，而且我不是最年轻的。和我曾经关过一个牢房的囚犯我记得有联动头目，八一中学的兰 XX、骆 XX，她们当时都是高中学生，因为是高干子弟，非常傲，谁也不放在眼里，连女看守都得让她们三分。当她们听说我是雄师的“头目”，马上和我近乎起来，说我们有种，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条线上的。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码事。闲极无聊，她们经常夸耀似地讲高干子弟的生活。她们觉得我愚腐，谈得并不投机。因为她们年龄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被释放了。

我还和北大的”反聂英雄“杨 X 关过一个牢房，她对雄师是满同情的，她说我们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说我们不想造反，只是不满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给他们提点意见。她说我们太愚腐。她经常在监狱里大骂聂，声音很大几，乎整个牢房都能听见。她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因为聂的后台是中央文革，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但她说她一定要和聂斗到底。后来听说她被判了刑，不知杨大姐现在何处，身体可好？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都可以给国家主席和老师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否则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彪付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我当时年轻气盛，

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好汉作事敢作敢当。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在不停的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我那时真傻。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作为活靶子批判，还没到校门口就看到扑天盖

地的大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朱 XX，冯 XX，X 平！”，“砸烂雄师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批斗会上我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昂地发言，揭发我的罪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如果光凭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不足以定罪众人也不服，他们必须要找到能上纲上线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科大XXX公社抄了我的宿舍，抄走了我的日记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日记，我爱写日记，文革中我的日记还写得特别详细，我每天到了什么地方，和那些人讲了什么话，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写在日记本上。我真佩服这两个月来雄师专案组工作进展神速，卓有成效，他们连明带夜地为我们每一个人整理了一大本材料，我的材料最丰富，当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师小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吓得心惊肉跳。我是五毒俱全，全都是能上纲上线的材料，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中央文革。这些材料有的是从我的日记本里断章取义的抽出来，有的是有人揭发的，还有的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是死猪一条不怕滚水烫，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了。有这一本材料我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世上有良心的好人还是不少，在把我们押回科大批判这天，当局没有给我们准备午饭，是我们班上的三个女友李春彦，陆宗伟，王云利给我从饭厅打了一份饭，当我见到她们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那顿饭是萝卜烧肉白米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饭吃下，她们三人都哭了。她们告诉我，我妈妈到北京来找过我，公安局不让见，我的妈妈就回到新疆去了。她们还想再和我多说一会儿，看押我的人叫她们走了。后来我知道批斗对象不是都象我一样幸运，有的没有人给送饭，那顿饭就没有吃。

批斗会以后，我回到监狱，想到妈妈和爸爸，他们对我抱多大的期望，特别是我高三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获奖和考上科大，他们多为我感到自豪啊。当妈妈到北京听到我关进监狱她会多么伤心，多么为我担心。但是她连见我一面都见不到。他们决不会相信一个二

十岁的大学生说了几句话转眼间就会成了反革命。但是批斗会以后专案组给我编了那么厚一本言论集，很多人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一个年轻的反革命就是这样产生了。漫长而单调的监狱生活，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掉，

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也许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但我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如果我坚持我的信念，我就要在这里渡过我的青春，将来即使平反了，我的生命也没了，我受不了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的大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要把我们的后台揪出来，在审问时他们一再追问我们和科大中高层干部有什么关系，科大保卫部长杨少增先生(曾经担任过刘少奇的警卫员)就是因雄师案被捕，科大不少中高层干部都受到了审查。公安局不相信几个青年学生没有后台敢写那样的大字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子女，大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的，主意是我们自己出的，标题是我们自己起的，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出生牛犊不怕不虎。

1967年是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监狱里关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是相当有来头的大人物。雄师一案因抓不到后台，看我们的认罪态度也较好，监狱里也装不下了，半年后公安局就把我们押回学校，交给专政队，由群众专政。

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从科学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那时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农场，爸爸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下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告

诉他们我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担忧了。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一铁厂，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我们系是在马鞍山钢铁厂。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我听说在淮南煤矿，在合肥，在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为是“雄师头目”自然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的写检查，交代。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杀了，我大吃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同系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心里一惊，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讲，谁也不许去。那天早上，张队长在大会上宣布，她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我听到说她在1966年12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份子。感到特别对不起她，觉得是我连累了她。当我听到有人在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呢？几年前当我们怀着美好的理想一起跨进科大校门的时候，谁会想到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批判会后工宣找我训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工宣队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给中央领导提了点意见。张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象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马钢一铁厂炼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七月的马鞍山，夜里，还有三十六七度，但我还得穿着长裤和长衣，

套上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湿透了，我拿着笔楞楞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聪明文静的女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我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象那可怕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短？

我走到门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我记得，安徒生的童话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了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明亮的，因为她是多么年轻美丽。那闪烁的星星告诉我，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的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过关？更不知道我的未来，象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

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当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亲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最坏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里，汗水和着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更何况人，无论如何，

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许多年后我读到琼瑶的小说，她说过同样的话，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需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的手里，今天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革命组织”给我编了一本《现行反革命份子周平反革命言论集》，我象被人要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象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我已经对任何的批判没有了感觉，反正说什么都一样。

我是一个非常不幸，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我的祥，我那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那给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伴侣。那时同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当我从监狱里出来，别人避我都来不及，他却常来看我，安慰我，陪我走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后来别人问他怎么当时选择了我，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接受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胆量。他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常常的日子，他没有必要自找麻烦，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我想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份。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到贵州，后来又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好残忍，他们连我这唯一的爱也要夺去，在他们看来象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爱。但我是人，是个年轻的女人，我是多么需要爱。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645 的徐小昆同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过江青而被列为全校第一号批判对象。他当时也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交换一下。当时他也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

答应下来，后来他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但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让我去了河南。后来他也到了美国。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1970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湖北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连队里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滦平，我的绰号就是“滦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孽，求得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视和冷漠的眼光，也习惯了运动一来就去当批判对象。

从农场分配的时候，自然我是被分到那最差的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有帽子，但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象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祥家庭出身好，但因为他是我的男朋友也受到特殊待遇，从安徽农场出来时，其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因为我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

1972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象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象一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多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马鞍山和军垦农场那些恶梦般的日子，我们再也不去当力挽狂澜的英雄，再也不要搞阶级斗争，我们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平平凡凡的人生。

## 第二章 西平县的儿女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在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元月年我



被分配到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要在农村安家。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要学的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寻找制造火箭，飞机和航天飞船的新材料。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火箭，导弹基地。当我们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师哥师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可是现在，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又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但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就到化肥厂去吧？

1972年我被分到县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了，我们在这里安了家。化肥厂后面有一个旧仓库，我们自己搬土铺地，用高粱秸围了墙，糊上白纸，又用高粱秸铺了个炕，我们还有一个桌子，两个木箱子，一箱子是书，另一箱子是四季的衣服。我们把这个旧仓库布置成了一个简陋而温暖的家。

在西平那几年的日子里，我们过着安静而平凡的生活，我遇到了一群善良友好充满爱心充满人情味的西平人，他们给了我们温暖，爱和友谊。我也亲身体会到河南农民的贫苦的生活。在西平县，我到厂里工人的家里做客，最好的待客饭就是芝麻叶蒜面条。在农村，白面是很珍贵的。西平县是芝麻和小麦的主要产地，但夏收收下的麦子大部分要交公粮，自己只能留下很少一点，他们一年的口粮主要靠秋季的玉米和红薯，白面只占15%或更少，我在北京从小吃大米白面长这么大，却还不知道，生产小麦的农民却很难得吃到白面。我们和厂里的工人处的很好。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象惊弓的小鸟，小心谨慎地活着。从不


在公开场合谈政治观点，也很少和别人谈我们的过去。但我们是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人，要我们不说话可以，要我们不读书，不思考真是办不到。我们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文学的，历史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原子分子谈到孔子，孟子，从史记谈到相对论，从蔡文姬谈到居里夫人，从我们的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但有一件事他绝口不提。那就是雄师的事，他知道我受的伤害太深，他希望时间能医治我心灵的创伤。

我深深敬佩我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学经济的，抗战时在重大商学院，马寅初先生是他们的老师和证婚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功底。妈妈能写一手苍劲的柳体，而爸爸写一手娟秀的赵体。小时候一到暑假，妈妈就叫我们背唐诗和古文观止。他们希望我能当新闻记者。我很喜欢文学，但更喜欢科学。高中毕业时我选择了科学，爸爸妈妈不相信我们家能出科学家，直到高中毕业那一年，我不但考取了科大，而且获得了当年的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奖，他们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科学家候选人。

爸爸是搞教育的，文革中，爸爸几次痛心疾首地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不上学，这个国家将来还得了吗？八年抗战打仗那么激烈，学校还在招生，学生还在上学，八年抗战中国还出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爸爸说得一点也不错，李、杨不正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念出ABC一样干革命的英雄，中学英语老师个个提心吊胆，他却要自己找上门。我们姐儿几个没少劝他，说他。我们说你闲着没事就在家呆着，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去教英语。他却固执地说：“你们看着吧，过几年你们都要来找我，学生们都会感谢我。”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这些年是爸爸妈妈用他们的爱抚慰着我的伤口。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们坚持学业务学英语。并给我们买了英语和大学教科书。他们说知识永远是无价之宝。装在自己脑子里，谁也拿不走谁也偷不了。虽然我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但为了工作的需要，这些年，我们已经自学完大学化学系和化工系的主要课程，英语也一直没有间断。几年后我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的化工专家。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健康、聪明、可爱的女儿。孩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当出生的女儿第一次躺在我的怀里吸允乳汁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无私与奉献。有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幸福，有孩子的女人是多么幸福。我愿把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我的孩子。那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只有85元，还要负担家里的老人，但仍然想办法保证孩子们的营养，奶粉、糖、鸡蛋、鱼肝油，这些在乡下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买给孩子。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渡过我们的一生。我再也不做梦当科学家了，再也不梦想当居里夫人了。能和心爱的人相厮相守，有了祥，我很知足了。但一想到我的孩子，我觉得对不起她。当孩子睡觉的时候，我会坐在她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看上几个小时，看着女儿细细弯弯的眉毛，乌黑浓密的头发，园园的脸庞，红润的小嘴，从打她一出生我就看，看不够，爱不够，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会象我这样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美最好的。每一个作母亲的，都会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我能给她什么呢？我能教她唐诗、古文、英语、科学，但我既没钱，又没权，既使有机会推荐上大学，也许会因为我的“历史问题”而给刷下来。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沙帐，回想着往事。说实在的，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右派份子，我才真正明白了，文化革命中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反革命，我才真正明白了，有知识，有思想，有良知，敢于讲真话的人就是和我一个下场。为了年青时说的几句真话，我不但要付出我的一生，还要付出我的子女的未来，记得我高中毕业时班上有几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当时听说是因为家庭有问题，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同样的命运就会落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好几次作恶梦，梦见因为我的历史问题，我的女儿被赶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怅惘，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我好不甘心呀！（未完待续）

## 【书讯】

## 书讯——《中戏宿舍22号》



本书是关于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代艺术家和学者的人生故事的真实记录。中央戏剧学院，这所由中国戏剧人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共同创建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高戏剧学府，从一开始就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戏剧人才，整合了当时东北、华北、南京、香港的戏剧资源。在短短几十年里，汲取当时苏联戏剧理论成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现代戏剧教学模式，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

本书以翔实史料为依据，通过描述住在北京东棉花胡同22号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的第一代戏剧人（十六位参与创建中戏的戏剧人）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他们为中国现代戏剧及其教育付出的艰辛努力，也演绎了时代环境下个人悲喜交集的人生戏剧。

这十六位第一代中戏戏剧人是：教务处长王负图，话剧系主任舒强，歌剧系主任马可，舞美系主任刘露，普通科副主任蔡松龄，戏剧史学者周贻白，台词教师郭蓝田，导演系教授何之安，表演系主任严正，导演系主任洪涛和夫人贺昭，舞美设计师齐牧冬，画家孙宗慰，高级翻译张守慎，民盟戏剧人徐步，舞美系讲师王宝康。

作者谨以此书，祭奠第一代中戏戏剧人的坎坷人生，意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书作者：周湘斌，中国戏剧史学者周贻白之女，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致力于家族史和个人史研究。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中关村创业大街昊海楼一层

010-8841 5586





#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http://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 二、定制服务：

### （一）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 （二）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 （三）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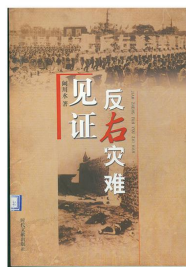
##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 【读者来信】

## 1. 胡宗式：杨继绳《天翻地覆》中的史实错误

近日看到杨继绳先生的新版《天翻地覆》一书，关于北京高校文革的史实，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特录于下，就教于方家：

1) 关于“二月逆流”，书中说：在内部批判几位革命元老的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层斗争的情况，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因此，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此处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中央文革只向谭厚兰一人透露消息（学部从哪里得到消息，不得而知）。3月7日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钢院“九一九”、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六单位发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其中五个学校，除师大“井冈山”以外，都不是红代会成员。中央文革并没有向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透露相关情况。

2) 书中说：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万人示威游行，反击“二月逆流”。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聂荣臻！与事实不符。3月13日在矿院红代会总部，开会讨论谭震林问题，我参加了。会议只谈谭震林问题。第二天游行，也是打倒谭震林。那时还没有提到陈毅等人的问题。谭震林之后提到的是余秋里，不过，从那以后，分成“打倒派”和“炮轰派”，红代会不可能组织统一的大游行。


3) 书中谈到北大社教：北大社教整个“翻了烧饼”：原来的左派成了右派，原来的右派成了左派。工作队将社教前期的左派和积极分子反映党委的材料交给了陆平等被批判的人，聂元梓等受到批评和斗争。会议气氛紧张，前一段社教积极分子被隔离，甚至限制人身自由。聂元梓等人不服，“顶牛”顶得厉害。聂还到中央上访，并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两边正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和社教运动也就停

下来了。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她被分配到怀柔县搞“四清”。


上面所说的，“聂到中央上访”，“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被别人取代”二事，属于空穴来风，事实上并不存在。

4) 1967年春夏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又重新组合为“天派”和“地派”。“天派”主要成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团派），。因“北航红旗”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天派”。“地派”主要成员有：“地质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等。因“地质东方红”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地派”。“天派”和“地派”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差别，同一派内部的想法也不一样。如“地质东方红”和清华的团派观点比较接近，而清华“四一四”却参加了地派。天地两派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有时搞一些小动作，如天派的韩爱晶和蒯大富在北师大扶持了一个和“井冈山公社”对立的小组织，和谭厚兰作对。

事实上，在1967年6月以前，并没有天、地派的称呼。当时只有北大派、师大派。两派的分歧点在于对吴传启的态度。以4月12日孙蓬一的讲话为标志，北大带领一部分组织向关锋的基层势力吴传启发动进攻。5月蒯大富和韩爱晶加入进来。这是一件惊动天庭的大事，引来了中央文革的打压。

6月5日陈伯达、谢富治发表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把轰轰烈烈的反吴传启运动打压下去。在这以后才出现了天派、地派的说法。

## 2. 胡杨：出书不要找美国南方出版社

从万维网上获悉，美国南方出版社是一对夫妻开的骗子公司，男的叫peter，姓王，女的姓夏，都是大陆过去的。这个公司的特点是招牌很大，宣传很强，书封设计很有特色。但合同之中藏着陷阱，且收费奇高，世界华语出版社每本书收费六百美元，而美国南方出版社收费一千三百美元。人们之所以找他，是因为他们说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他们出的书。这其实是一个骗局——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书号是假的。



## 【本刊聲明】

##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